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潘 漫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姚华庭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5 年第 5 期 总第 157 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 任 编 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张 丽
杨 玲 殷一榕

政党制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机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 董伟伟 孟 欣	4
人民主体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 袁一苇	12
基础·内核·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三维审视 / 赵 婷	19

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 冯钰婕 洪向华	26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面向 / 张艳斌	35
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威慑运用——基于美国经验的若干思考 / 葛汉文	44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华文化

-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逻辑理路 / 谢欣桦 邓显超 53
-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论内涵、现实问题及实践进路 / 谢 波 李子轶 62

民营经济

- 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嬗变探析 / 刘招成 张泽宣 71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5 - 05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机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董伟伟 孟 欣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数字民主实践提供了新的契机。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三种机制赋能数字民主实践:技术适配机制突破信息处理边界,功能互补机制提升民主参与效率,领域拓展机制推动民主实践深化。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数字民主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境与风险:既有其自身的发展瓶颈,也有技术异化、资本逐利带来的方向偏离,以及伦理规范滞后等挑战。因此,需要从“技术—社会—伦理”三重维度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路径,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民主形成良性互动,以技术赋能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

21 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1]这一论述指出了数字网络空间与公众意见形成及表达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数字民主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民主形态,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

重要环节。一般认为,数字民主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通过扩大民主参与主体、优化民众参与渠道、重构公共决策机制、强化人民权力监督网络等方式,推动民主过程向更具包容性、回应性与透明度方向转型的民主形态。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深度学习与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迅速“走红”,深刻影响数字民主的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重构民主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形态,实现民主价值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拓展。同时应看到,这一过

收稿日期:2025-08-13

作者简介:董伟伟,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哲学;孟欣,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路径研究”(22ZDA067)、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层数字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4YB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程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风险,需要从“技术—社会—伦理”三重维度探索困境破解和风险治理的路径,在释放技术赋能效应的同时,守护数字民主的核心价值。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机制

传统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数字民主存在着信息处理壁垒、政民沟通效率低、单领域流程不完整以及跨领域拓展不足等问题。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能够通过技术适配机制、功能互补机制和领域拓展机制赋能数字民主,克服传统数字民主的诸多不足,推动数字民主发展到新的阶段。

(一) 技术适配机制:突破信息处理边界

在传统民主场域中,民主辐射动员范围有限,民主发展的规模难题与信息不对称难题难以有效解决^[2]。在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民主参与主体在基层协商实践中受限于物理空间的阻隔和时间成本的约束,无法实现广泛的政民互动。数字协商民主作为数字民主的主要实践形式,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们都能够通过数字媒介广泛参与到民主过程中,充分发表对于相关政策的见解。然而,在非人工智能数字民主实践过程中,参与主体可能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了解相关政策,一些带有主观性或目的性的政策解读,可能会误导参与主体作出错误的决定、发表不正当的言论。此外,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互联网平台上的民意也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对民意的收集、整理难度也越来越大。海量碎片化的网络民意和专业复杂的政策文本之间形成的信息处理壁垒问题,制约了民众的民主参与和政府决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强大的学习和生成能力,能够通过学习大量的数据,理解并模仿人类的创作过程。”^[3]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不仅能够根据人们的提问快速从海量数据库中抓取核心观点作出相应的回答,也能帮助政府部门快速整理

庞杂的民意信息。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功能打造技术适配机制,有助于人们突破信息处理边界。技术适配机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深度学习功能抓取民意要点、依托自然语言处理功能通俗解读政策以赋能数字民主的一种技术机制。一方面,其深度学习能力助力政府部门突破了人工处理民意的局限。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和广度对互联网平台上庞杂的网络民意数据进行全面抓取与深度挖掘,快速识别不同话题下公众观点的主要脉络。同时,还能精准区分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根据数据的分析结果清晰地梳理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共识和观点分歧。另一方面,其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将复杂的政策文本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对话内容,帮助民众理解公共事务和相关政策。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降低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还可以提升政府洞察民意的效率与精准度,使其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促进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桥梁。

(二) 功能互补机制:提升民主参与效率

数字民主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基础上,实现了群众诉求与政治回应之间的有机联系^[4]。人们可以借助各种数字媒介平台了解相关政策并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改善了传统的民主参与过程中借助的媒介种类单一、信息传播速度慢进而导致政民沟通不及时的问题。然而,网络平台上的政策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碎片化,在非人工智能条件下民众难以从中提取出核心观点。随着政策信息的增多,问政量随之增多,面对数量庞杂的提问时,相关人员难免出现回答不及时的现象。加之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回答相关政策问题时难免会带有个人的认知、立场或倾向,一旦误导公众,便可能导致公众作出与自身真实诉求相悖的选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性和交互性体现在其不仅能够根据人们提供的要求创作出相应的内容、实时分析并回答人们的提问,还能以客观的生成逻辑减少主观因素对政府回应质量的干扰,

从而有效缓解非人工智能数字民主在政民沟通效率方面存在的不足。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性与交互性特征,通过功能互补机制提升了民主参与效率。功能互补机制以实时性特征提升数字民主参与的时效性,以交互性特征保障政民沟通的客观性,从而在效率与质量两个维度对政民沟通方式进行系统性优化。一方面,实时性特征能够助力数字民主的参与更具时效性。面对互联网平台的海量碎片化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信息整合与分析能力,在短时间内进行筛选、梳理和提炼,精准识别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要素。同时,根据民众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分析其历史浏览记录、搜索关键词等相关行为数据,精准把握民众的兴趣点和需求方向,从而实时提供定制化的政策信息服务。例如,当有新的政策出台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一时间将政策信息推送给需求高度匹配的民众,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动态。另一方面,交互性特征保障政民沟通效率。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地域限制等障碍,拓展了基层民主决策的空间,还优化了决策流程,提高了决策效率和准确性^[5]。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提高了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会议纪要的整理和政策文件的起草等工作。再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回答过程高度依赖数据与算法的客观逻辑,在回答提问时,严格遵守程序预设的政策标准、法规条文和公共利益导向,避免了因个人立场、情感等因素导致的解读偏差,能够为民众提供更规范、更客观的信息反馈。功能互补机制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从效率与质量两个维度对政民沟通机制的系统性优化,不仅激发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提升决策的精准度,也为政民共识的形成与巩固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 领域拓展机制:推动民主实践深化

非人工智能数字民主的任务分配通常是以部门为单位,某一部门分管某一任务,若某些部门

无法完成单领域内不同类型的任务,可能会导致民主的单一流程不完整。此外,当执行跨领域任务时,若工作人员能力不足,可能导致执行效率低下、任务质量无法保证和团队合作障碍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功能性主要体现在既能于同一领域完成多种任务,保障单一流程完整;也能跨领域自适应调整,支撑数字民主实现跨领域协同办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功能性特征,通过领域拓展机制促进数字民主在同一领域的延伸和不同领域的拓展。领域拓展机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多功能性特征,通过完成同一领域内的不同任务实现数字民主全流程覆盖,并促进其向不同领域拓展,进而打破数字民主实践的领域限制和能力壁垒,推动数字民主不断纵深发展的机制。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完成同一领域内不同类型的任务,从而促进数字民主在单一领域内实现全流程覆盖。在内容生成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快速生成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工作计划、会议流程等;在政务服务方面,智能对话系统能够不间断地响应群众咨询,自动提取关键问题并匹配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了数字民主在不同领域的拓展。在政务服务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分析并回答人们的问题,提升人们参与民主过程的便捷度;在社会治理方面,它能够分析整理海量的民意,快速抓取核心观点,优化政府部门的决策流程。领域拓展机制以技术赋能为核心驱动力,显著提升民众参与民主实践的便捷性与有效性,为数字民主的纵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政府决策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驱动向科学的数据驱动转型,最终助力数字民主完成从理论构想向实践创造的关键跨越,使其成为增进数字民主效能的重要力量。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困境

数字民主的发展拓宽了人们参与民主实践的路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民主的赋能,则

进一步重塑了人们的数字生存形态。“在广泛使用智能手机和数字终端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数字行为实践创造出数字性的社会生存方式。”^[6]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其赋能数字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可能衍生诸多风险。

（一）技术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困境

技术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双刃剑”的特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更是深刻体现了其双面性。一方面，以颠覆性力量促进数字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数字民主的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可能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根据人们日常偏好编造信息，使人们陷入信息的回音室。

“回音室”是“一种持续地主动排除其他相关声音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们开始不信任所有外部来源”^[7]。当把其他不被信任的声音排除在外时，人们更容易陷入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织的信息茧房，丧失对信息的整体性把握，迷失在自我意识中。“看似自由多元的互联网实际上强化了个人偏见，可用于达成共识的舆论空间进一步撕裂和坍塌。”^[8]算法黑箱引发的回音室效应与信息茧房的叠加，不仅消解了公共舆论的共识基础，还会不断侵蚀社会稳定根基，加剧社会认知的片面化与判断失焦，导致公共话语空间的持续萎缩和社会信任体系的深层耗损。此外，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会导致人类的自主创新能力下降。

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可能引发数字鸿沟。经济发展不同的地区其数字能力也不相同。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个人数字设备，而由于缺乏相应的设备、技能和知识，他们在数字能力上也普遍低于城镇居民^[9]。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阻碍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运行、资源分配及民众参与等方面的实践。

“群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的人群之间对数字化产品的掌握技能的不同产生的数字鸿沟，尤其是老

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银发数字鸿沟。”^[10]从技术接受度看，老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适应能力普遍低于年轻群体；从成长背景来看，老年人成长于科技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长期习惯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工具，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内心可能本能地产生抵触。银发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充分契合老年群体利益，影响政策制定的全面性与公平性，难以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民生目标。

（二）社会层面：技术异化与资本逻辑干扰下的社会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层面的算法黑箱与数字鸿沟问题，暴露了技术应用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异化与资本逻辑干扰下的社会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技术异化。技术异化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指的是技术从服务人类的工具，逐渐演变为支配人类社会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的干扰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愈发偏离技术普惠的初衷，扭曲了技术服务人类的本质，加剧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民主发展的社会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数量爆炸式增长，但却愈发碎片化和表面化。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强调效率、量化和可操作性的技术理性思维模式影响下，逐渐变得单一化、机械化，失去了对事物本质的洞察能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能力。在技术理性的裹挟下，人们逐渐变成了一种被技术驯服的单向度的人。此外，“当对数据的信赖蜕变为依赖，就形成将数据奉为偶像的数据崇拜”^[11]。当人们在应对问题时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认知层面的钝化效应，即主体盲目崇拜数据，逐渐丧失对现状的批判性审视能力，主动思考的意愿与深度显著衰减。认知钝化主要表现在一遇到问题便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发起提问，在获取答案后立即终止思考。这种认知钝化反映了主体在技术赋能背景下认知的主动

性消解,使人陷入对技术输出的被动屈从状态,不利于数字民主的发展。

在资本逻辑的干扰下,掌握技术与资本的企业和群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常常无视算法的社会属性,反而不断凸显并强化其商业属性。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凭借高效、智能的特性快速占据市场,民众在享受其带来的效率提升与生活便利时,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这种依赖背后却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对民众“顺从主义”^[12]的塑造。“民众以为是基于自身的理性和判断而做出的投票与选举,殊不知却成了资本与数据公司的提线木偶。”^[13]其二,资本逻辑干扰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就业不平等与劳动异化。一些企业或组织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大规模引入人工智能产品代替工人的重复劳动,即使保留少数人工岗位,也会陷入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即劳动者沦为数据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失去劳动的创造性与价值感。其三,在资本逻辑的干扰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扭曲民众的文化价值导向。一些企业或平台为快速吸引流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产出低门槛、浅层次、娱乐化的内容。当民众长期沉浸其中时,会逐渐丧失对有价值的文化内容的感知力与鉴赏力,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削弱主流文化对社会共识的凝聚作用。更严重的是,长期处于低质内容的影响下,民众的价值判断会发生偏差,致使数字民主沦为情绪化表达的舆论场。

(三) 伦理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挑战

技术异化与资本逻辑的干扰扭曲了民主参与的社会生态,当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深度交织时,伦理失序问题便会动摇民主发展的根基。“技术与资本的联姻,致使科技创新能力与其摧毁性潜能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伦理转向的步伐,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迄今为止仍然困扰着人类的道德伦理难题。”^[14]

一方面,部分企业和机构滥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肆意收集、使用用户的个人数据。“平台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通过超大规模的数据挖掘、数字监控和算法分析,利用这些数据来控制用户,让普通民众在数字世界里裸奔,甚至把这些数据滥用于商业来往以牟利,从而引发用户信息泄露风险,只有极少数群体才能在数字领域获得隐私保护。”^[15]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企业肆意收集用户数据,严重侵犯民众的个人权利。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无序扩张,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过度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隐患。大量重复性工作被机器替代,部分人因此失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资本与技术深度绑定的社会结构中,政策制定的话语权逐渐向掌握数据的企业倾斜。技术本应成为解放生产力的工具,却在无序扩张中异化为加剧社会割裂的推手。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正在将民主异化为少数技术精英的独角戏,让基层民众的声音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里日渐微弱,逐渐沦为民主的旁观者。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模糊,不仅容易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也会在赋能数字民主的过程中威胁整个体系的安全。在民众参与民主的过程中,部分企业或个人滥用技术手段,通过伪造数据、操纵网络水军等手段,模糊了真实的民意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边界,严重干扰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责任主体模糊如同悬在数字民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编造的虚假评论和投票数据当作真实的数据来源和信息资料,并将其应用到民主参与过程中,民众便会受其误导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侵蚀数字民主的民意基础。而由于法律框架的滞后性、技术的解释壁垒等问题,现有的问责机制难以构建精准、有效的追责惩戒体系进而对虚假数据信息制造主体进行追责。责任主体模糊不仅会影响民众对数字民主工具的信任基础,还可能引发对政府的信任赤字,威胁数字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三、“技术—社会—伦理”的三维协同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科学应对这些挑战，充分化解技术应用与数字民主发展的潜在风险，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亦是摆在人们面前亟须深入探索、妥善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规避技术风险，弥合数字鸿沟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实践中，既要着力破解算法黑箱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筑牢技术应用的安全底线，也要积极弥合不同地区与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打破信息壁垒，保障民主参与的广泛性与公平性。

第一，数字民主过程透明化。数字民主过程透明化是规避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黑箱问题的关键路径。政府部门需向民众公开筛选机制，使人们接触到更全面的社会议题，避免算法黑箱主导的信息灌输，重塑民众对信息整体认知。民主过程的透明化不仅能够打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技术隐蔽性引发的民众信任危机，还能通过公开化的决策逻辑与信息流动，遏制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对民众认知固化的危害。信息壁垒的破除与认知局限的突破，能够为公共讨论场域注入开放包容的活力。当公共讨论场域融入了多元的声音，个体对信息的整体性把握能力将得到重塑，形成更为稳固的共识舆论空间。民主过程透明化还可以促使民众在技术应用中保持理性，避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过度依赖。此外，政府需明确技术在信息生产、决策辅助中的功能边界，避免思维惰化侵蚀民众的批判性思维，培育他们自主思考与创新能力，为民主决策的真实性、可靠性筑牢基础。

第二，弥合地区和年龄差异导致的数字信息壁垒。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区域落差不仅体现为技术本身的分布不均，更反映出经济基础、人才储备等结构性差异。弥合由地区

发展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需构建东西部协同发展、城乡共同发展的长效发展机制，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优势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的深度耦合，推动技术要素、数据要素向西部流动，从根本上推动区域间民主实践的技术公平化发展。缩小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区域落差，能够消解经济与人才结构性差异带来的区域发展壁垒，为数字民主在不同区域的公平实践筑牢技术根基与发展保障。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作为弱势技术群体，老年人更需要被关注关照。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适老服务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让许多老年人陷入数字困境。政府应加强数字包容性政策供给，推动公共服务平台适老化改造。社区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等场所，培训、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智能手机的基础操作，同时搭建邻里互助交流平台，鼓励老年人分享数字使用经验。数字企业需聚焦老年群体行为特征，开发简易化、场景化的数字应用产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技术适老”的立体化解决方案，让数字文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筑牢代际共融的技术支撑。

（二）提升民众数字素养，保障社会公平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层面的风险防控为数字民主扫清了技术障碍，但若忽视其社会困境，仍会威胁数字民主的民意基础。此外，在资本逻辑的干扰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依赖、就业的不平等及文化价值取向的扭曲等问题，都对数字民主的实践造成了威胁。为了缓解以上问题，需要从提升民众数字素养、促进社会公平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强化主体意识。政府需要同其他社会部门共同努力，消解技术理性带来的危害。其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化民众的主体意识，着力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既使其能够依托技术赋能的便捷展开思考，又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和对未来图景的前瞻构想。还应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将批判

性思维训练、社会问题分析能力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让民众从教育过程中建立起“技术工具服务于人”的认知框架。其二,构建良好的数字民主参与环境。社交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信息传播和“把关人”的作用,客观公正地选取、报道社会的热点问题,引导民众进行理性思考和讨论,培养其主体意识。学校应通过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数字民主素养教育,从小培养学生对数字民主价值的理解和参与能力。社区应搭建多元公共讨论平台,鼓励民众围绕技术应用、社会发展等议题展开理性思辨,在观点碰撞中深化对自身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构想。政府与社会各领域推动形成多方协同、民主共治的数字生态,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社会。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树牢人民至上理念,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首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规则制定与公共服务算法设计等关键环节,充分利用政务平台、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等渠道为民众提供发声空间,破除技术依赖与“顺从主义”的危害。其次,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劳动异化、数据垄断等问题,政府应明确企业或组织的技术应用边界,赋予劳动者劳动价值话语权,保障其对劳动过程的掌控感与价值认同,还应杜绝数字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最后,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推送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优质文化内容的方式(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复原历史文化场景、解读经典文学等),强化主流文化对社会共识的凝聚作用。同时,加强对数字舆论场的规范管理,明确情绪化、极端化内容不得进入公共舆论核心领域的判定标准与处置流程,防止数字民主异化为民众的情绪宣泄场,着力打造理性、有序的数字民主讨论环境。

(三)健全数字技术监管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层面的治理为数字民主

筑牢了参与基础与公平底线,但伦理层面的价值失序若不予以规范,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仍会偏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衷。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一直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维度,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更要警惕技术的无序扩张,应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数字技术监管体系,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发展筑牢根基,使其在赋能数字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的作用。

第一,构建全流程数据监督管理的相关法律体系。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价值日益凸显,数据泄露不仅损害企业利益,而且影响行业生态”^[16]。除此之外,数据泄露还可能侵犯民众的个人隐私,威胁个人财产安全。政府部门需强化对数据使用的监管力度,建立全流程安全保护机制。从源头防范数据滥用,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实践营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其一,企业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前,需提前告知员工技术的应用计划及相关的岗位变动,保障员工的知情权与参与协商权。其二,开展岗位影响专项评估,对经科学评估确需撤销的岗位,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员工提供转岗培训、职业技能提升或合理的经济补偿,确保员工下岗后权益保障的落地落实。其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原则作为数字技术监管的“方向盘”,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促进数字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认定与追溯制度。面对由算法设计、技术应用与商业运营构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复杂生态,传统单一主体问责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权责边界模糊的挑战,需从平台与政府两个维度入手,协同破局。其一,平台和企业需主动承担算法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责任,如运用技术手段实时监控算法运行过程中的异常数据和风险信号,对推荐算法引发的信息茧房、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及时进行风险管控。同时,制定权责明确的应急响应

预案,在风险发生后做到快速溯源、及时处置,降低风险对社会的危害。其二,政府需明确算法开发者对算法设计中的伦理缺陷、数据偏见等问题承担原始技术责任,并要求开发者在技术、算法等研发阶段同步开展伦理审查机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包含技术原理、风险评估等在内的伦理合规报告。此外,政府还应强化算法备案与可解释性的强制要求,建立全链条的算法追溯制度。以全流程伦理审查为抓手,明确企业须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备算法架构、数据来源、训练逻辑等关键信息,构建技术决策可追溯机制。凭借追溯机制,监管部门可以在出现技术纠纷或风险事件的第一时间,根据备案资料逆向追溯算法决策的全链条,精准锁定责任环节,有效解决责任主体模糊的问题。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认定与追溯机制,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数字政府的信任,夯实数字民主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四、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重塑传统的民主形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技术适配机制突破传统数字民主的信息处理壁垒,以功能互补机制提升了政民沟通效率,以领域拓展机制推动了民主实践深化,三重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数字民主的优化发展。

然而,技术嵌入过程中暴露的三重困境相互交织、层层叠加,单纯依靠某一领域的治理手段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困局,亟须构建“社会—技术—伦理”三重维度的协同治理方式,以民众数字素养培育与社会公平保障应对技术理性的侵蚀,以民主过程透明化与数字鸿沟的弥合破解技术的结构性矛盾,以数据治理法规与责任追溯制度规范技术伦理边界。通过构建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机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正向应用铺平道路,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夯实民主根基的建设性力量,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5.
- [2] 张明军,李天云.数字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动因、内涵体系与构建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3):2.
- [3] 冉奎,李芳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问题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4):36.
- [4] 董伟伟,曹凤霞.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优势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6):61.
- [5] 陈荣卓.基层民主治理能力与全过程人民民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79.
- [6] 蓝江.数字时代下的社会存在本体论[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4):39.
- [7] 考科尔伯格.人工智能政治哲学[M].徐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98.
- [8] 杨春林.数字时代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技术动因[J].国外理论动态,2024(2):153.
- [9] 李石.数字治理的优势与隐患[J].学习与探索,2023(10):63.
- [10] 王春英,李金培,黄亦炫.数字鸿沟的分类、影响及应对[J].财政科学,2022(4):77.
- [11] 文成伟,王杨鹏.现代性视角下“数据宰制”的解析与消解[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20.
- [1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8.
- [13] 陈永胜,张健.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25(1):11.
- [14] 曹瑜.从技术伦理走向责任伦理的现代性——约纳斯责任伦理观述评及其马克思主义之维重构[J].教学与研究,2023(6):81.
- [15] 唐任伍,马志栋.平台伦理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矫正对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4(2):62.
- [16] 孔瑶,郝岩.以数字化治理推动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宏观经济管理,2025(3):67.

责任编辑:王天海

人民主体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袁一苇

摘要：人民主体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根本逻辑遵循，人民主体主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实践，塑造话语体系的内嵌价值、孕育响应时代国情的话语内容、赋予政党制度话语辅政为民的功能作用。人民主体性强调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主体的本质特征，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然而，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与发展的现实看，存在制度话语体系的主体互动不够、人民主体的“话语生产者”角色与主体实践的“话语原产地”作用有待增强、对制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与过程性特征关注不足等问题。建构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进一步彰显其人民主体性，实现“集体”“群体”与“个体”层面的多元平衡，发挥话语体系主体的认识能动性与实践能动性，唤醒主体自觉、培育主体自信，提升话语能力、凝聚话语智慧。

关键词：人民主体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这一观点把从“主体”“实践”出发认识事物作为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传播是主体主导、服务主体诉求的主观能动实践，具有突出主体性。这一主体性可从

三方面理解：一是话语体系背后总有主体存在，没有主体，话语体系就是一堆没有意义符号的堆砌，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二是话语体系内嵌主体的价值观念，服务于主体的价值追求，具有强大的“为我性”；三是主体主导话语体系运作，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话语体系，同时运用话语实践改造现实世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制度实践、理论与价值的描述与阐释系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实践中建构而成的。人民主体性突出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主体

收稿日期：2025-05-19

作者简介：袁一苇，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党制度、参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24CDJ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本质特征,是建构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根本遵循。进一步厘清话语体系建构发展背后的人民主体逻辑,探索其人民主体性提升的路径策略,能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实践提供启发和借鉴。

一、人民主体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根本遵循

人民主体贯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实践,是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遵循的核心逻辑,制度话语体系的人民主体性特征使其价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内容始终符合中国实际,运作始终准确有效,集中反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的人民民主价值。

(一)主体—价值逻辑:人民主体地位塑造话语体系的内嵌价值

话语总有其特定价值立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主体是人民,他们在实践中推进制度发展、促进制度完善。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民民主,“制度话语的价值指向体现着利益代表的‘人民性’”^[2]。

其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内核。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其话语体系内嵌“多元一体”“和合包容”的集体主义精神,力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广泛真实的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其制度实践指向团结民主与长治久安,话语体系运作以实现人民民主、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旨归,体现了全人类对于民主、发展、稳定的共同追求。

其二,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优势。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多党合作格局的中心。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格局。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与民主党派始终保持亲密友党

关系,为新型政党制度筑牢思想与情感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价值能够实现的根本保证,使新型政党制度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漫长实践中,虽经历波折却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在新时代仍然焕发制度活力。

其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追求。主体的“为我性”决定话语体系总是建立在特定立场之上。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在议题设置、内容表述与实践运作上,力求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实现人民的现实诉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政党的共同目标。”^[4]由此可见,无论是静态话语表述,还是动态话语实践,“为了人民”始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根本指向。

(二)主体—内容逻辑:人民主体实践孕育话语体系响应时代国情的核心内容

追求自我实现的主体(人)是话语体系的生成起点,主体是历史实践中的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凝练理论、创新概念表述,使话语体系处在动态发展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是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照搬复述,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实践成果。

人民主体的实践经验构成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人民主体的需求变化为话语体系内容更新提供动力机制。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广泛凝聚力量,这一时期话语以“号召联合”与“安抚肯定”为主要内容。194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民主党派定位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6],并通过“不是一根头发,

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7]的表述，充分肯定了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1956年，通过“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8]等话语解决了党内对多党合作产生的动摇困惑。

改革开放后，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内容突出“规范完善”主题。1979年，邓小平将民主党派明确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9]，指出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0]，明确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定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1]“民主党派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12]等表述开启了政党制度话语建设新阶段。此后，新型政党制度被写入党章、宪法，《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出版，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断规范化、完善化。

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进入凸显“创新自信”的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4]“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15]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表述，进一步突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与比较优势。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从政治话语层面初步建构了一个科学、完整、系统的政党制度话语表述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6]，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制度优势与实践效能，充分彰显了对政党制度这一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强大自信。

（三）主体—功能逻辑：人民主体诉求赋予话语体系辅政为民的功能作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实践

中，人民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话语体系、更新话语表述、创新概念、丰富理论。人民的主体作用促使话语体系的“表态性功能逐步外溢为建设性功能”^[17]，这不仅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能够解决制度解释与理论阐释问题，还能解决国家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助力人民主体自身发展。

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赋予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引导与塑造社会的功能。作为话语体系内容标准与传播秩序的制定者，主体为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提供规范，使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在话语传播中塑造社会价值。无论是静态话语表述还是动态话语实践，以“人民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对于形塑社会主义民主的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政党制度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8]“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19]“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20]等表述是这一话语体系对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统一的充分阐释，能够传播“何为真正民主”的正确认识，提升民主意识与民主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涵育民主价值观。“和合”与“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尊重多元、包容差异、突出共识。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亲密友党”“通力合作”“风雨同舟”“好同事”“好帮手”等表述则倡导求同存异与包容合作，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可以有效实现语言的教育教化功能，增进思想认同，助力营造和谐、包容、平等、团结的社会氛围。

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诉求赋予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维护稳定与优化决策的功能。话语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话语输入，有效吸纳、整合社会力量，将人民的多元诉求转化为政策输出，实现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维护国家稳定的功能。无论是文件政策的上传下达，还是座谈会、

约谈会的交流沟通,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运用话语工具参与制度实践,完成对重大事务的充分协商,发挥专业与智力优势,有效促进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通过提意见、作批评、出建议等话语实践形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督促干部履职,约束不当行为,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的程序化与规范化。同时,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表述与话语实践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具有稳定民心的作用,对合作型、和谐性政党关系的强调也有利于强化社会成员的制度自信,维系政治系统稳定。

人民自我发展的需求赋予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政治社会化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实践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在于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与解放自我。对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而言,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参政过程,是政治参与的合理化与程序化过程,民主党派联系的那部分群众通过话语实践,将自身意见输入决策、监督等政治活动中,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成果。这一过程可以有效提升其话语效能感,使实践参与者充分感受到自身主体地位,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自信。民主党派成员运用表达、沟通、宣讲等话语形式,参与协商、管理与政策执行,在此过程中增进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了解,学习政治知识,提升自治能力,提升政治素养,规范政治行为。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人民主体性尚待强化

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1]。话语的建构、表达与传播并非单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单向活动,而是主体间的交互性实践。人民主体性特征凸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价值本质,但从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传播的现实情况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人民主体性仍需进一步突出。

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主体互动需进一步加强。在政治活动以及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主体常常被局限在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三者内,政党制度背后的人民主体概念一定程度上被简单化、缩小化,导致社会大众缺乏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度认知,容易形成“事不关己”的制度冷漠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主体是现实的,从事话语实践的人们,本质就是人民。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主体是集体概念,强调整体而非个体。以历时性视角看,不同时代主体在心理、知识及实践上存在差异,使其呈现多样性。以共时性视角看,主体在具体实践语境中同样存在国家、组织、个人等不同表现样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是这一话语体系主体的核心与代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实践的关键参与者,在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创新与传播中担负着重要使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普通民众与上述话语主体的互动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人民主体的“话语生产者”角色与主体实践的“话语原产地”作用有待增强。作为描述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宏观语言系统,制度话语体系是从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探索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的产物。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从“参、代、监、改”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70余年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的实践过程就是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丰富完善过程。与实践发展相比,新型政党制度标识性概念提炼的“质”“量”存在不足,部分话语存在宏观空泛现象,有的简单套用文件表述或领导讲话,形式上轰轰烈烈,但话语体系僵硬且缺乏现实吸引力,话语体系化、系统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存在仅把话语体系理解为静态语言符号本身的认识局限,对制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与过程性特征关注不足。目前,许多观点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直接等同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党制度运行过程中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话语、议政话语、协商话语与监督话语等具体实践话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研究过多关注理论表述系统,对话语表达、传播与反馈的实践环节关注不足,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生成机理、传播机制与反馈效果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与重点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运作是以人民为主体的过程性实践,不仅内含话语表述等静态内容,更包括生产、传播、接收与反馈等动态机制。只有“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22],作为人民的主体实践来研究才能呈现话语体系的全貌,从而进一步推进话语体系建设。

三、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23]。面对“两个大局”的机遇与挑战,只有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人民主体性,才能进一步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一) 实现“集体”“群体”与“个体”层面的多元平衡

民主从来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声”,主

体的多元才能带来声音的多元。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主体——人民群众是一个集体概念,但在话语实践中具有多种表现样态。要充分发挥话语塑造价值、稳定人心的作用,实现更为广泛有效地凝心聚力,就必须做好话语体系主体“集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协调平衡,确保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内嵌价值的多样性、表达形式的层次性与治理功能的有效性。

第一,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要从各层面规范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制度实践中的核心话语权,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把旗定向”的领导作用。党要在实践中丰富政党制度的核心概念与主流表达,提升自身话语能力,完善政治话语表述系统,在探索中形成这一制度话语体系的内容标准与程序原则,主导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实践。

第二,要积极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政党制度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话语主体作用。要进一步探索规范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话语输入渠道,通过体制内任职安排与体制外力量吸纳,充分保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话语权利。要把以专家学者为话语主体的学术话语体系作为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藩篱的突破口,塑造开放包容的政党制度研究环境,保障新型政党制度学术话语产出的质与量。鼓励专家学者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方法研究探讨新型政党制度,使用系统且富有逻辑的语言对政治话语进行学理化阐释,打造好政党制度政治话语的“资源库”与“说明书”。要鼓励支持专家学者通过书籍、期刊、会议等渠道发出声音,“寓政治话语于学术话语之中,通过多种切实可行的途径把中国学术话语传播出去”^[24],增进中外政党制度研究者的互动交流,为世界打开认识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窗口。

第三,要重视吸纳普通民众,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等非官方主体在政党制度议题上的话语力量。要突出普通民众的话语主体地位,引导网络

意见领袖、自媒体从业者做好舆论宣传,打造精锐传播团队,有效运用其传播力、引导力与公信力,激发民间媒体的柔性话语力量,共筑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做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间话语的宣传工作,增进普通民众对政党制度特色优势与运行机制的认识,支持普通民众参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部分政治活动,引导普通民众表达对政党制度实践的认识与建议,推动政党制度话语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

(二) 强化主体的认识能动性,唤醒主体自觉、培育主体自信

第一,要理性看待西方在长期政党政治实践中积累的话语优势,掌握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自主权,独立主导中国政党制度话语实践。要坚决驳斥西方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歪曲,坚持在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议题上,中国才是“主持人”。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25],只有中国自己才能立足自身实践,提炼好政党制度的中国概念,阐释好政党制度的中国经验。同时,“独立主导”并非“闭塞排斥”,要正确对待西方在政党制度议题上的话语优势,辩证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性的政党关系,突出人民主体在话语实践中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辨别能力。在学习中借鉴、批判中吸收西方政党制度体系与政党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智慧,寻找中西方政党制度话语在价值、概念、范畴与表达等方面的融通点,打破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间的区隔,推动世界正确深入地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第二,要增加话语主体的效能感与使命感,使其主动践行话语责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对于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生产传播与持续发展均负有主体责任,要重视利用话语体系履职尽责,做有责任的发声者。话语主体应当充分认识话语体系

所具有的形塑社会价值、影响国家决策与服务国家治理等功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构成的话语基础具有充足信心。要强化自身话语权利与责任意识,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与文化交流等活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结构内容。

第三,要突出话语原创性,精耕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本土特色”。话语的原创性来源于文化的民族性与实践的具体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竞争力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基础,而文化基因是影响话语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和合”文化与“大一统”传统塑造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内核,实现了多元利益整合、多种群体合作、多股力量团结、多样智慧凝聚。要在“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一与多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上深入发掘,打造高质量的原创性话语。同时,只有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话语才能真正打动人,要立足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实践开展话语创新,重点关注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实践特别是基层实践,在微观实践层面凝练出更多能够入耳入心的政党制度原创话语。

(三) 发挥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提升话语能力、凝聚话语智慧

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背后的多元主体力量,既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从外部层面实现吸纳、培养与保障,更要充分发挥主体自身的实践能动性。要重视提升人民主体的话语能力,在话语生产、传播、反馈的过程中有效运用话语智慧,在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

第一,在话语生产环节,要重视提升议题设置能力与话语创新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议题设置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角色”“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合作型政党关系的内涵”等国内外存在误解与模糊认识却高度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且高频的讨论。充分利用好会议、座谈、交流等政治与学术平台,增加新型政党制度的“曝光度”。同时,话语创新的本质是

理论创新,要立足时代、立足实践,深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学理性思考,在政党制度实践中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6],实现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文化价值与实践效能的创新表达与充分阐释,完成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第二,在话语传播环节,要重视提升策略选择能力。话语主体在传播实践中要保持对“语境”的高度敏感,根据国际与国内不同语境,选择恰当的表达风格、传播方式与宣传渠道,优化传播效果。国际传播以“扩大影响”为核心追求。要充分利用政治与文化资源,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在具体话语实践中的作用,建立良好关系,开展有效交流。要学会借助一些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定认同度与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与表述,循序渐进、由表及里,促使世界全面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搭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层实践活动平台,积极引导民众参与政党制度实践。借助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与广泛性优势,提升话语的亲密度、吸引力与感染力,推进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基层传播,实现多渠道多层次传播的协同增效,以话语认同强化制度认同。

第三,在话语反馈环节,要重视提升倾听与反思能力。话语作为主体间的交互性实践,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听者”能够听得见、听得进、听得懂。要始终关注话语对象的反馈,提升话语反应能力,积极回应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问题与困惑。要及时解释、有力驳斥关于政党制度的误解与歪曲,杜绝延迟反应、避免舆论发酵。要追踪比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教育水平与国别特征对象的话语反应,时时反思、深入思考,有针对性地完善表达内容与传播方式,从而实现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自我更新与动态发展,使其能够在历史与实践中永葆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161.
- [2] 刘华超,李伯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优势、境遇及优化路径[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2):36.
- [3][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346.
- [4][18][19][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18、15、18.
- [5] 陈延武.万水朝东[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9.
- [6][7]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4、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16.
- [9][1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4、205.
- [11][12]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79、480.
- [1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3-02-08(1).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93.
- [1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15-16.
- [16][23][2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2、486、16.
- [17] 池步云.中国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互动历程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4):192.
- [22]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1.
- [24] 秦宣.正确处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13.

责任编辑:王天海

基础·内核·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三维审视

赵 婷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政党制度,具有典型的内生性和鲜明的理论特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理论内核以及深远的理论价值。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阐释,是打破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窠臼,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基础;理论内核;理论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政治创造,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于近代中国人民政治道路的实践探索,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不断发展完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以来,学界围绕其制度结构、比较优势、话语权的提升等内容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聚焦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是深化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只有不断深化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阐释,才能将这一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讲清楚,从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建构系统完整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一、理论基础: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生发起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理论结晶。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指导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其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

收稿日期:2025-01-19

作者简介:赵婷,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24CDJ044)、青岛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独特优势与世界意义”(QNSZ20241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方面,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必须组成自己的阶级政党,最有觉悟、最有战斗力的政党领导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他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只有建立独立的政党,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化程度,强化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密联合,使其真正以阶级的整体力量而行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了创造性发展:从中共一大纲领中“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立场,到中共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多党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对这一理论作出了生动诠释。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民主政党进行联合,这是实现革命斗争目标的政治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单靠共产党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寻求同民主政党建立联盟,形成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合力。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在与民主政党合作时要保持独立性和坚持掌握领导权,一旦放弃,无产阶级运动取得的果实就会被其他政党占取,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型政党制度才能不断发展完善,凝聚起

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推动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政治智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理念,描绘了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治理目标,社会资源属于全体成员共有共享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政治整合的共识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思想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层理论基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赓续“大道之行”的文明基因,又赋予其“人民性”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3]。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这一合作逻辑聚焦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使政党从“利益代表”升级为“公共价值创造者”,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具象化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初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以独特的文化基因构建了“和合共生、协商共治”的政治生态。“和合”思想内涵丰富,一方面内蕴“和而不同”理念,体现要素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内含“和合共生”理念,体现多元要素的和谐共存,其核心命题在于包容差异、协调矛盾,实现整体和谐,强调差异中求共识、多元中求统一、矛盾中求共生,这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哲学基础。合作、和谐、共赢等文化基因深深嵌入新型政党制度,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与西方“非此即彼”的政党竞争逻辑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造性转化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既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尊重利益表达的多样性,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的政治合力。

第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立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解决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突破。从“统一战线”策略到“基本政治制度”,从“政治联盟”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百年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联合进步力量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科学论断,为多党合作奠定理论基础。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开创了合作理政的早期实践。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民主党派从“阶级联盟”向“政治联盟”转型。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首次以党内文件形式确定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创造性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彰显出高度制度自信。2021年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系统阐释多党合作制度历史逻辑与理论体系的纲领性文献,它构建了政党关系范式、民主实现形式、制度评价标准以及政治话语体系,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从实践探索迈向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二、理论内核: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精髓要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具有政党制度的普遍

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开创了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它既区别于垄断型的一党制,也不同于竞争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结构创新、功能突破和效能转化的有机统一,构建了兼具稳定性与创造力的政治文明新范式。

其一,从结构维度看,“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打破旧式政党政治的零和博弈模式,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结构,形成“领导核心统合—多元力量协同”的差序化体系。

一是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强化政治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接受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4]。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都对核心领导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积累的政治基础、政治经验、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动员力^[5],因此其核心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并不断巩固。在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指明和把握政治方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纠正背离正确政治方向的行为。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协商与监督相协调,提高决策质效。协商与监督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实现合作,彼此之间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各民主党派作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界别,通过政协会议、提案、专题调研等方式开展协商活动。在协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对话、讨论和沟通来达成思想、

政治和行动统一。民主监督是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重要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相互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这种监督并非对抗性,而是一种“协商式监督”,即融协商和监督于一体,这种监督不具有强制力,其主要方式是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具有鲜明的合作性、建设性。简言之,这种协商与监督相协调的结构优势,使民主协商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三是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契合,增强制度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以来,在 70 多年的多党合作实践中,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适应形势任务变化,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机制,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活力,展示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政党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中的独特魅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激发了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

其二,从功能维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民主实践与政治整合,形成了民主深化与整合升级的协同创新格局。

一是从形式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升维。将民主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技术,构建“真实性民主与程序化协商”相统一的实现民主的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更好地保障了真实有效的民主得以实现。一方面,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体现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代表本党派成员及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具体利益。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形式,决策过程的协商性决定民主的实现程度。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党委、政府在决策前畅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专业化水平;在决策过程中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将协

商民主贯穿履职全过程。

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多元利益协调—战略协同的全链条整合体系。能否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是评价政治制度功能的重要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对政治制度的整合功能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建构起一个能够最广泛地联系社会、最大程度地整合社会力量的政党体系,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化,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提供组织基础和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统一,凸显强大的整合力。数据显示,仅在 2020 年这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就在定点扶贫县等地区实施 213 个帮扶项目,为定点县如期脱贫摘帽作出了重要贡献^[6]。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体现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其三,从效能维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势能积累与治理动能释放的辩证统一,形成了稳定与发展的“双螺旋”效能结构。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效能,“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创造秩序、促进发展的能力,是否达到治国安邦的水平”^[7],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性的充分彰显。

一是政治稳定的生成机制。一方面,使命型政党与功能性参政的耦合实现政党关系的长期和谐,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突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西方国家因地缘冲突、种族冲突等问题造成“混乱”“失序”的社会状态,暴露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弊端,使国家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以协商代替分歧、以合作代替竞争,有效避免社会对抗、矛盾激化,最大限度减少政治内耗和社会撕裂,促进各方面关系协调,推动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

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多元智慧防风险的双重优势，具有内生的危机应对协同性。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时，执政党与参政党紧密团结，发挥各自优势，展现出强大的协同应对能力，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稳定的信心，社会韧性得到提升，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是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智识供给系统与权力运行结构的深度融合，构建了兼具治理智慧与数字文明特征的嵌入机制。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检验一个国家政党制度成色的试金石。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8]。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拥有众多经济、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绕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等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调研，以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多元视角和科学依据，有助于制定符合经济规律、适应市场需求的政策措施。

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最终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演变过程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有力佐证。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以稳定锚定发展边界，以发展筑牢稳定根基”，促进良政善治，为人民美好生活倾力护航，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三、理论价值：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中国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蕴含着对传统政党理论的突破与超越。这一理论创新不仅重塑了政党关系架构，更以全新视角诠释了民主内涵与国家治理逻辑，打破了西方理论界的话语范式，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第一，合作型党际关系丰富了政党制度理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体现了政党类型划分的理论创新。西方国家以是否掌握国家政权为标准，将政党划分为执政党、在野党、反对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不是执政党联盟意义上参与执政的党，也不同于西方政党体制中的在野党或反对党。民主党派不以掌握国家政权为目的，但他们并不是隔绝在政治体制之外的旁观者或局外人，而是拥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二是为政党制度的划分引入新的变量，丰富了政党制度类型。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政党组织政府、国家治理，因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实行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以政党数量和规模为标准，将政党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此基础上加入意识形态因素，将政党制度类型划分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单一党制和霸权党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多党合作制度，坚持协商合作，而非竞争与对抗，其理论创新是对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霸权壁垒的突破。

第二，代表型党群关系创新了民主政治理论。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化了民主内涵。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其本意是人民的统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类型和民主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如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参与民主

理论、自由民主理论、人民民主理论等。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人民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地位，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化机制，体现了人民民主与精英民主、多元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的本质区别。在精英民主理论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人民只有选举时才会被重视，选举结束后则被排除在国家治理之外，民主异化为投票选举；多元民主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竞争性上的，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个人权利大大扩大的基础上，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9]。在竞争中寻求平衡，不仅这种理想状态中的民主很难呈现现实效果，而且最终获益者往往是利益集团而非广大人民群众。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宽了民主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西方以票选为标尺的形式民主的超越。中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能够依法享有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在不断扩大民主权利中更多分享到民主红利^[1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贯穿协商民主精神，在制度践行中推进协商民主建设，作为内生性民主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统合型党政关系发展了国家治理理论。党政关系，即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长期的国家治理进程中，我国党政关系发生了适应性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政关系逐步变革为党领导下的全新模式，这是一种不同于“党政合一”与“党政分离”的新型党政关系。“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功能边界模糊，党在国家事务中大包大揽、政府职能虚化，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党政分离”则在性质、职能、内容和方式上割裂党的领导与政府管理，严重削

弱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此外，我国党政关系也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西方分权制衡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即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来维护政治稳定和避免权力滥用，这种制度设计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鲜明体现，各权力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导致议行分离、治理效能低下；同时，政党之间为获得选票不断恶性争斗，一些政治势力刻意迎合并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如民粹主义抬头、极端政党群体崛起、“黑天鹅”事件频现等，致使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等面临严峻危机^[11]。在我国新型党政关系中，党和政府互相依存，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党政分开，党和国家机关共同掌握公共权力，存在分工的是公共权力的三个部分，即决策、执行与监督^[12]。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战争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塑造了中国政治体制，这一历史逻辑已经赋予党内在的“国家身份”^[13]，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非包揽一切，而是把方向、谋全局。党政关系呈现多层次、多面向互动的特点，这种政党关系新模式的政治优越性通过外化的国家治理效能逐步呈现。

四、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华文化基础、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的政党制度，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巨大的优越性。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具有典型的内生性特质，但并非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吸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中国化。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彰显独特优势，其价值不仅局限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和国家治理，还蕴含着对普遍性价值规律的探索，特别是独立探索和尝试了对权

力、权利等关键政治要素的重新建构,丰富了现代政治的内容,创新了现代民主的思维、形式和路径,拓展了现代政治、现代民主的选择空间^[14]。这为局囿于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其他国家提供成功借鉴,打破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窠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涵,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增量贡献,提高了这一制度理论在世界政党政治研究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8.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82.
- [4] 袁廷华,李金河.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概论[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5.
- [5] 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55-356.
- [6] 黄昌盛.聚力攻坚战 同心谋振兴——各民主党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N].团结报,2021-02-05(8).
- [7]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369.
-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 [9][10] 柴尚金.政党与民主新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48、240-241.
- [11] 赵婷,蒋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意蕴[J].学术前沿,2022(10):109-111.
- [12] 张国军,程同顺.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及其调适[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38-149.
- [13] 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15(2):99-114.
- [14] 徐峰,高国升.正谊明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76-177.

责任编辑:王天海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冯钰婕 洪向华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继承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民主思想,结合时代特征,创新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内涵,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须从理论维度入手,厘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和思想逻辑;从历史维度着眼,探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对人民民主思想的历史延伸;从现实维度着力,揭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对时代问题的回应。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维度,共同构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历史;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1]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秉承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民主思想,结合时代特征创新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内涵,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发展逻辑与现实图景,对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理论维度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基层立法联系点时,第一次使用“全过程人民民主”,他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收稿日期:2025-08-21

作者简介:冯钰婕,中共贵州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思想政治教育;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23GZQN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2]。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民主的创造性阐述。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实行的民主政治形式及其理论体系。“民主”概念经历两千多年发展，逐步扩展为包含政治理念、思想理论、政权形式以及政治制度在内的政治体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的政权形式，在现代社会，民主成为主要的政体选择。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样包含了政权形式、思想理论、制度机制等丰富的政治内涵。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是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近代以来，经过阶级斗争，民主逐渐分化为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阶级性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区别于其他民主形式的最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时代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也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即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成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

（一）科学内涵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3]这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前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框架遵循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与宗旨，也由此决定了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的基本性质，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我国的权力体系围绕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展开。这也是我国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因。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体现了人

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都反映出人民民主的重要原则，都遵循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4]三个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实践涵盖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构建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理念、制度精神、价值取向融入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丰富了民主的形式和渠道，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政治成果。党的目标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根本立场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这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要以“人的幸福”为主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个“具体地、现实地”要求，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二）理论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蕴含丰富的理论资源。厘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是进一步学习领会的必然要求，应从理论方位、理论主体、理论特质和理论方略等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在理论方位上，明确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阶段的认识。认清自身历史方位是明确理论方位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两个大局”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历史方位，

也是当前我国人民民主理论遵循的现实条件。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处的国内大局。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党实行“三三制”以团结党外人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体制改革为我国各领域带来了活力,也为社会主义民主注入新的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新的时代课题和目标任务,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国所处的时代方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处的国际大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6]。某些西方国家以“人权”旗号插手各国事务,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破坏,诋毁、丑化、抹黑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应对外部环境对党的执政和国家安定团结带来的挑战,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实现新的发展,解决新的问题。

第二,在理论主体上,深化了对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7]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领导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民生福祉。从毛泽东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8],到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9],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的领导的重大判断,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愈加深入,对于党的领导作用把握更加精准。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我国实行的民主政治形式,必然蕴含丰富的民主制度程序和广泛的民主参与实践。因此,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发展中,要一以贯之坚持党的全面、系统、整体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各领域。同时,对人民群众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主

体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判民主的主体理应是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本国人民来评判民主”,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在理论特质上,创造性阐述了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链条”,贯通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方位”,做到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事业和各项工作“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为我国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赋予全过程的特征表述,更完备、更准确地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特质和现实属性。

第四,在理论方略上,理清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路与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八个能否”衡量标准^[10],从国家领导层、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社会各方面、国家决策、各方面人才、执政党、权力运用八个层面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否能够起到实际效用。其中国家领导层面的要求起主导作用,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社会各方面起主体作用,国家决策、各方面人才、执政党、权力运用起保障作用。“八个能否”的衡量标准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总体要求,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思路。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历史维度

(一) 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有必要回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致力于成为人民公仆。人民公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定位。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以实现人民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民公仆思想来源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公仆”理念。1871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民主留下了宝贵经验。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府^[1],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把所有政府的公职人员变为社会公仆,使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由人民作主。为了保证公职人员履行公仆职责,巴黎公社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废除旧官僚的经济特权,使公职人员的工资与普通工人一致。为了防止公仆沾染官僚习气,巴黎公社禁止其利用公职身份兼职牟取利益。同时还限制政府的日常开销和公仆的装饰物,主张建立廉价政府。二是实行普选制,人民公仆都由选举产生。无产阶级的普选制与资产阶级的普选制的根本区别在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通过无产阶级普选制选举出来的人民公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指导,还具有较高的能力素质。三是人民公仆接受人民监督和批评,向人民负责。巴黎公社规定,人民公仆的日常政务都必须如实记录并公开供人民检查。为保证人民对人民公仆的监督真实有效,公社专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进行管理监督。列宁指出,人民公仆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利益一致。人民公仆制度可以从根本上祛除资本主义的长官特权,在各项制度的保障下,人民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

第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民主要成为现实,必须取得国家政权。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民主成为资本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的武器。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壮大,逐渐拥有政治影响力,并要求以新民主代替封建阶级的旧民主,其中最典型成果之一是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并颁布了

《权利法案》。资产阶级的民主超越了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使更多人分享到国家主权带来的政治权利。然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并没有覆盖到社会的大多数人,也未保障人民多层次的民主权利。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必须形成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掌握国家政权,使国家权力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其二,无产阶级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超越。民主作为主权在民的政治概念,其人民的含义随统治阶级更替而不断演变。封建社会的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定资质的人民,主要包括贵族、奴隶主和城邦侍卫等,数量庞大的奴隶不享有民主权利。资产阶级民主超越了封建主义民主,但是其阶级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是在资本运作下实施的民主,体现在金钱对民主决策、民主活动、民主管理的影响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可以干预选举、行政和司法过程。部分资产阶级的道德哲学家将资产阶级道德理念抽象化为永恒真理,并视其为普世意义的道德观,例如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抛开现实的人谈价值观念。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并揭示出资产阶级哲学家试图将道德观念转变为抽象且固定的思想。抽象化的民主在当代表现为崇尚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这种民主的“普世价值”要求所有国家抛开具体国情和人民要求,实行完全相同的普世化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限制的”^[12],无产阶级民主实现了在人数、范围、层次上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超越。

其三,无产阶级民主是向共产主义民主过渡的必然途径。无产阶级民主通过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废除资产阶级特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民主实现后,广大劳动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使用国家政权发展生产力,提高自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阶段处在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3]阶段转变的过程。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采取保持不断革命的方法,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14]。在未来社会,无产阶级民主必然向共产主义民主转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民主的现实目标。

(二) 赓续党的人民民主思想

回顾百年历程,党的人民民主思想发展历经了四个阶段,从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是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初步探索人民民主的选举制度。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制度,集中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1937年5月12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人民民主的选举原则。首先,选举制度的普遍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区域内,不论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要不违反边区法规并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能够获得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次,选举制度的平等性。《条例》规定,居民每30人选举乡参议会议员1人。最后,选举制度的直接性。《条例》指出,根据地选举“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选举制度”^[15],选民不经过中间环节直接选举各级参议会议员。这种直接的平等的选举,能够减少由中间选举环节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保证选举人通过直接方式选出议会代表,从而保障选举的民主性,激发选民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正式建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阶段。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也为人民民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建设的总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从创立起就坚定地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建设的突出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原则的具体途径,展现出我国政权属于人民的根本性质。中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6]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7]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30多年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中国取得重大进展。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人民幸福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积极拓宽民主渠道,激发人民参与积极性,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贯穿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了人民民主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8]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不仅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属性,并且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作用范围。就前者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属性的进一步重申,就是创造性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提出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方向。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下,经济社会发展向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前

进。就后者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进一步拓展实践深度、广度与高度,通过人民民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全面推进,贯穿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不断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及各类协商民主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逐步深化,确保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有效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这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的实践探索将党的人民民主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焕发出属于中国智慧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实践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围绕实际问题展开,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层次,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民主思想的最新成果。

(一) 理念构建: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遵循,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民主是一个历史概念,随历史前进而不断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创新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是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的现实要求。

第一,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20]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人民民主理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的。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人民民主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人民民主理论在不断拓宽视域中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要拓宽人民民主的理论视域,就要加大人民民主理论的研究力度,赋予人民民主以时代性、创新性。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人民民主的理论内容。

第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深度。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是“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21]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原则,深化人民民主的理论深度,不仅加深人民民主的理论层次,更能彰显人民民主的理论价值。人民民主理论具有多层次的理论意义,包括唯物史观的道德依存、群众史观的价值基础、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质、人民至上的思想原则等等,对人民民主的理论层次进行梳理和深化,是历史发展对人民民主提出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底蕴,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推进有了更为有效的发展路径。

第三,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的理论,也是集聚人民智慧的价值理念。“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22]人民民主既是民主理论的中国模式,也是中国道路上的民主实践。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巨大的理论优势,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要彰显人民民主的理论优势,必须加大理论宣传,不仅要求党员贯彻这一原则,也要使人民群众认识、理解、支持这一思想,从而增强人民民主的认同感和战斗力。宣传人民民主理论,使人民民主成为团结人民群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优势的重要途径。

（二）场域拓展：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层次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实践。在新时代推动人民民主，就要加大人民民主的实践力度、扩展人民民主的实践领域，使人民民主实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

第一，加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3]。人民民主实践就是要通过巩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加强人民民主的实践，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和渠道，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范围、层次和质量。发展完善人民民主的实践机制，形成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的系统实践机制。坚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民主选举权，依法监督选举过程和结果，保证人民选举成为人民民主的基础。坚持广泛的民主协商，拓宽协商渠道，使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参与到国家方针的决策中来，保障决策的合理化。创新基层民主的实现方式，使人民群众通过多元化、信息化的手段有效参与到基层民主的管理、教育、服务和监督中来。完善党内民主，健全党的制度，保障党员合法权利，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内民主成为带动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途径。

第二，扩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人民民主实践经验。例如，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与国家法律的修订、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以及各项国家事务的管理，通过基层民主制度实现选举、决

策、管理和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24]。三个“具体地、现实地”明确指出，要使人民民主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必须加深人民民主的实践层次。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践必须与人民群众的需要息息相关。在革命时期，人民民主的实践围绕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需要展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的实践围绕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进行；新时代，人民民主的实践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践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拓展空间。

（三）制度优化：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发展，不仅要创新理论和实践内涵，更要完善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涉及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5]。要通过不断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持续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作用。要加强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和监督工作。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推动监督工作走深走实，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激发基层人大创新活力，持续畅通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

建好用好代表联系群众的平台,让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的革命和建设目标奋斗的新型政党制度。其创新之处在于:克服了少数利益集团掌握国家政权的弊端,能够真实、广泛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避免多党派的恶性竞争,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解决了党派冲突引起政策断裂的负面问题,推动政治决策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在新时代,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更要推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不断巩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政治制度。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是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必然前提。新时代,必须健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处理好民族地区多和少、公与私的关系,在权力约束中保证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维护其合法权利。为充分彰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关键作用,需大力推进法治化建设,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精准界定民族区域自治的权限与责任,保障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益。与此同时,强化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干部的服务意识与专业能力,确保民族地区群众能够切实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事务决策。构建并完善民族地区民主监督机制,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民族地区人民当家作主。

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实现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

监督的制度,以充分保障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各项民主权利为原则,由居民(村民)委员会宣传政府政策、反映居民意见。新时代,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基层群众自治的基础作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要总结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的历史经验,明确其性质、任务和作用,对以往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创新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合理优化居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在精简机构的基础上确保工作有效开展。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使人民群众主动自愿参与到自治环节中来。借助信息技术,拓展网上议事厅、流动票箱等便捷渠道,使全过程人民民主走进寻常百姓家。通过多种方式,把基层群众自治建成系统完备的工作网络,不断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 [1][21][23]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36、336、304.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5.
- [3]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1.
- [4][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9、60.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716.
- [6][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6.
- [8]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5.
- [9]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8.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9: 158.
- [12] 列宁全集: 第三十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04.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4.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718.
- [15] 陕西省档案局. 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 [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20: 16.
- [16]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8.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801.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0.
- [1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33.
- [20][24][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8、261、261.
- [2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2023 年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7.

责任编辑: 王天海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面向

张艳斌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实践,不仅表现为时间维度的演进历程,也表现在空间维度的秩序重塑。中国式现代化以特定的空间为实践载体,包含着复杂的空间结构和深刻的空间变革,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和丰富的空间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关系性、自主性和文明性的特质。政党与空间的建构关系、资本与空间的塑造关系、文化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阐释方式。新征程上,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正义;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治理;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战略。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特质;政党引领;空间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命题,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概念范畴。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主要特征、显著优势、基本规律、价值意蕴、经验启示、发展理路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理化阐释。总体而言,主要沿着三种研究路径展开:一是基于历史的视角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和历史经验;二是基于比较的视角把握中国式现

代化的突破与创新;三是基于关系的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等深层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实践,不仅表现为时间维度的演进历程,也表现在空间维度的秩序重塑。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这一论断对空间的实践性意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式现代化以特定的空间为实践载体,包含着复杂的空间结构和深刻的空间变革,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和丰富的空间关系。空间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秩序与实践,

收稿日期:2025-05-10

作者简介:张艳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研修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开放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BNUSZPXZX23YB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阐释专项项目“教育强国建设中思政引领力提升研究”(CCNU25ZZ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也影响着空间的形态和功能。因此,从空间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和展开,有助于深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理论特质、制度优势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特质

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日常生活体验的基本维度,也是描述和阐释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维度。

“现代化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发生和展开的,同时也不断对空间进行改造和重构。”^[3]从全球现代化的滚滚浪潮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空间深度参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构之中。空间成为理解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变革、剖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关系性、自主性和文明性的特质。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关系性特质

任何一种实践总是处在一定的空间和场所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成功推进和不断拓展的。在此过程中,空间经由实践实现了从自然领域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空间体系。空间容纳和承载了复杂的关系,存在着各种关系的交织和交互。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4]。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伟大实践内蕴着深刻的空间转换和空间提升的意涵,致力于通过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重大变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致力于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空间格局。空间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背景和场域,而且是可以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加以辩证整合的重要视角。“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

存在。”^[5]空间是经济、社会、政治力量等综合作用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的形成和构建同样如此。

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聚焦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特定的空间展开,所取得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现代化空间秩序重塑和空间格局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方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实践的立体目标,如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多方面空间形态的历史性变革。比如,在经济空间方面,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在政治空间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取得新进展;在文化空间方面,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在社会空间方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生态空间方面,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交织和交融中不断进行空间拓展与空间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构想,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空间延展,不断推进全球空间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多领域空间交错、各层次空间互嵌、全方位空间重构的整体性变革的特质,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体性空间交织、系统性空间交融的历史性发展。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自主性特质

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6]近代以来,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深刻社会空间变革和独特的实践创新,现代化逐步由被动裹挟转为主动

动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获得新认识,在实践中推进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的自主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强烈的历史使命驱动下,以中国场域为空间范围,以中国实践为基本依据,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寻求现代化的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实践的自主性既是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依循中国独特的时空环境、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也是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坚持自主性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7],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自主探索,而非依赖西方路径。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国家特性、民族特质所构筑的自主化、多元化空间格局,超越了西方主导的空间霸权。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开启了全新的现代化叙事。从更为宏阔的历史维度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8]。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掌握历史主动,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实现了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的历史性转变、从“现代化的追随者”到“现代化的引领者”的变革性跃升。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和再版,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性和重大原创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自主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现代化方案,能够科学阐述其价值,有效回应和引领实践。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

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9]。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把握现代化共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构建起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机制,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封闭僵化,而是避免随波逐流;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改旗易帜,而是避免故步自封。只有正确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才能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了更为自主的实践探索,锻造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0]。从现实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自主性特质,突破西方空间异化,打破西方空间霸权,迈向自主性发展的现代化空间。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展现出文明性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空间实践呈现出显著的文明性特质。这不仅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在物理空间上的投射,更是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发展交织互动的生动体现。从历史纵深到当代创新,从区域变革到全球联通,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深刻地诠释了文明传承、激活、凝聚、互鉴与共生的新路径,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是在空间传承中维系文明脉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赓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其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中得到了深刻体现。这种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古或模仿,而是在深刻理解文明基因的基础上,对历史文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

文明脉络在现代化的空间形态中得以延续和新生。

二是在空间迭代中激活文明活力。文明的活力在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正是通过不断的空间迭代，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物质载体和动力源泉。这种迭代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借助现代科技、理念和方法，对空间进行重塑和升级，从而激活文明的内生动力。

三是在空间整合中强化文明凝聚。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中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治理来体现，不断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是在空间交融中促进文明互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中通过促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空间交融来体现，打破隔阂，增进理解，实现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与互学互鉴。

五是在空间联通中践行文明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空间实践不仅着眼于国内，更放眼全球，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的全球空间网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文明共生理念。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

空间不仅仅是实体性意义上的场域，也是社会历史过程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展现。事实上，空间被卷入和扭结到多重关系之中，对于社会发展具有诸多实践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化阐释，有必要形成对空间的多维、辩证的理解，从空间的物理性形态和社会性意义的结合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展开分析。具体来看，政党引领、资本驾驭、文明形态等议题同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实践深度勾连和深刻关联。政党与空间的建构关系、资本与空间的塑造关系和文明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空间阐释的重要方式。

（一）政党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政治

“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1]现代化进程中，空间是政治运行的重要载体和实现机制，空间的形塑和规训深受政治的影响和支配。正是由于空间和政治相互形塑的机制，空间的生产也就被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居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首，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中也是排在首位。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空间变革背后的引领和主导的政治力量。“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联。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全面引领和深刻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空间变革。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提供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关乎中国式现代化中带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又是破解现代化各种难题的现实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势，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的关系：一方面，把握顶层设计的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价值尺度，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感、计划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实践探索坚持以顶层设计为指导，注重总结经验，注重把握规律，注重解决问题，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能。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提供方向指引。注重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科学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推进路径。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提供主体力量。强大的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始终发扬斗争精神，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汇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四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提供社会条件。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推动者和践行者，能够广泛号召和深度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力量。

（二）资本驾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塑造

空间是资本运作和资本增殖的内在张力。资本按照其内在规律进行空间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13] 资本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变革的现实力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呈现两面性。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的“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因素，既能推动空间的发展，也会导致空间的非均衡扩张。一方面，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机制，资本通过空间完成自身的生产和分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空间变革。另一方面，空间影响资本的流动方向，资本的逐利性促使其向核心区域、优势空间集聚，导

致区域、城乡空间发展失衡。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的合理重构要求引导资本在空间均衡分布，进而消除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不均衡空间发展。在经济领域，资本要素的空间均衡分布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空间正义的内在要求。例如，资本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合理引导资本下乡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建构中资本参与空间的发展与治理绝非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前提，而是以人的发展为标准 and 尺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在现代化空间建构和发展中合理利用资本的积极效用，同时又能注重社会发展的人本逻辑，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开创了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基本特点就是驾驭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发挥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作用，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民生福祉。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资本发展的边界和限度，克服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生态危机、社会撕裂等，使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本框架内运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现代化的系统性超越。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导发展的空间生产逻辑，强调把资本作为要素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并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避免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有效规避资本对人的价值的僭越，顺应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互动

任何现代化的模式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之中。对现代化进行人文向度的反思，不难发现，现代化社会的变迁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营造过

程,更是一个深刻的人文转换过程。“文明的转换必然带来空间的转换,而空间的转换又确认并表征着文明的转换。”^[14]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紧密交织。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空间的不断提升和转换。思考空间与文化的社会性联系,关注空间中的价值秩序和文化意蕴,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拓展到精神文化的建构,有助于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只有站在人类文明演进和文化发展的高度,才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向度和文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5]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双向奔赴和彼此成就的逻辑关系。

首先,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悠久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和革故鼎新的文化动力;统一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交融;包容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兼收并蓄的文化胸襟与文化气度;和平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的文化基因。总的来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规律性认识,展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发展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滋养。

其次,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主动,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相融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

质要求相融通,“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相融通,等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中国式现代化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自身发展。

最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中国式现代化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人类破解现代化道路面临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的文化构筑,蕴含着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些独特性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紧密结合起来加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之进步趋势就是一个各自社会的特定空间持续不断地扩展、提升与转换的过程。”^[17]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强调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空间演进,不仅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力量,而且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过程。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变革突出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实践效能和光明发展前景,有力地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生命力。将空间作为方法论,既是基于对空间本体论的反思,也是基于对空间辩证法的回应。新征程上,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正义;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治理;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战略,以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复兴”。

（一）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以空间物化方式的形塑，是社会正义的立体表征。”^[18]空间正义关联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可能，关系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空间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包含诸多事实、行动和要素的系统工程”^[19]，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and 生态等领域的正义都是空间正义指向的对象，都应纳入空间正义的范围。“空间的生产、占有、分配、消费必须用正义的价值理念来进行规范”^[20]，空间正义蕴含着伦理、价值的向度，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和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1]中国式现代化空间正义的实践展开需要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使其真正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是要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高空间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发挥空间价值，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需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空间生产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二是要建设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聚焦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新要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三是要构建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让人民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总之，空间正义的充分实现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

落实和生动呈现^[22]。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聚焦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交互和融合，使空间成为承载人民归属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进而实现空间正义。

（二）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3]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压缩和任务叠加的特点，既为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而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也使诸多社会矛盾和风险集中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并相互交织，显著增加了推进现代化的难度。这些矛盾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以空间矛盾的形式呈现，如城乡差别、区域差异、收入差距等空间问题。“空间中存在着冲突与矛盾。没有这些冲突和矛盾，人们就不可能理解‘批评’的冲突。”^[24]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各类空间的有效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举。因此，我们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空间治理化解空间矛盾，应对空间冲突，消除空间异化，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空间基础。

一是从空间治理主体看，要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联动。既要坚持政党引领，充分发挥党在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要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在产业、生态、社会等方面的规划引领和服务功能。同时，激发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活力，努力打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空间治理格局。二是从空间治理内容看，要求打破空间边界，进行整体治理。

空间治理涉及自然空间和人造空间的各类构成要素,涉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诸多活动。空间的自然性、政治性、社会性均是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推动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的协同治理。三是从空间治理方式看,要注重空间差异,异质化的空间形态要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展开和系统性推进,必须回应现代化进程中在空间层面的矛盾,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5],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要以农村空间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同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总之,遵循空间治理规律,提升政策制度效能的协同性,构建良好的空间关系和空间秩序,推动空间治理现代化。

(三) 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战略

空间战略是“从地理坐标的横向维度出发,从区域空间上确定推进现代化的重点地带、优先顺序和操作内容”^[26]。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整体性转型和均衡性发展,要深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战略,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寻求发展和治理之道,进而推动空间合理变革。

一是重构空间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是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统一,既表现为国内空间的重塑,也展现为国际空间的开拓。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夯实国内大循环空间生产基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空间联动生产,让资源要素在不同空间充分涌流,实现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重构。一方面,着眼国内空间,“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和国土空间体系”^[27]。另一方面,着眼全球空间,通过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空间联动,共享发展机遇、共担风险挑战、共建公平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空间基础和空间支撑。

二是优化空间功能。空间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基于空间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进行协调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系统科学的布局,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的全方位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各个方面、领域和环节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诸多要素的高效协同和有机联动。

三是重塑空间秩序。深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战略,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空间布局上的均衡性和全面性,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的空间整体”^[28]。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构筑和空间策略要积极回应百年变局,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空间善治,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良好的全球空间秩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9.
- [3] 袁伟华,张百灵.超越西方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与空间再造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5(1):25.
- [4]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8.
- [5]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M]. 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82.
-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

- [7][8][25][2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214、25、26.
- [9][16][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24、10、171.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53.
- [11][24]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第二版 [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7、39.
- [1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21.
- [14] 陈忠. 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3: 30.
- [1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7.
- [17] 刘怀玉. 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64.
- [18] 胡潇. 空间社会逻辑寻绎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163.
- [19][22] 靳文辉. 空间正义实现的公共规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9): 113、113.
- [20] 张佳. 论空间正义的生态之维 [J]. 北京大学学报, 2020(1): 41.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9.
- [26] 胡伟. 现代化: 世纪的追逐与思想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291.
- [28]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83.

责任编辑: 张丽

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威慑运用

——基于美国经验的若干思考

葛汉文

摘要:作为国家间争端或冲突的一种形式,国际危机是国际行为体在特定时期呈现出的根本性紧张关系。不同类型的国际危机会导致安全局势加剧、冲突风险抬升或军事力量介入,对国家间的和平与安全、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秩序和全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危机管理被认为是在特定危机场景下,在更好地维护自身核心价值与利益同避免事态升级为战争之间寻求总体平衡。威慑一般被视为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当作在不爆发直接冲突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的首选工具。近年来,美国在应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因台湾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时,仍沿袭冷战经验,以威慑战略作为应对危机、争取利益的主要方式。对中国来说,应对之要点在于明确对方触发和升级危机的“阈值”,同时审慎评估己方采取进一步手段,突破对方“阈值”的成本,甚至在适当时机可以主动试探对方“阈值”,削弱其威慑的可信度,迫使其在核心问题上作出战略性让步。

关键词:国际危机;危机管理;威慑;美国;台海危机;国际安全

国际危机长期以来是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考虑到国际危机引发的重大安全后果,很多国家都力图在博弈对抗过程中最大程度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又不至引发重大国际危机;一旦国际危机爆发,也要防止其升级,以免引发直接武装冲突甚至全面大战。如何成功地进行危机管理,成为各国决策界政策制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认为,威慑是在危机管理诸多方式当中的一项重要手段。冷战时期,威慑在国际危机爆发、升级或消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

经验一再表明,威慑战略亦同国际危机之显现与升级存在紧密联系,部分国家奉行的威慑战略甚至成为促发危机乃至升级危机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主要大国关系紧张及国际总体安全形势显著动荡,国际危机出现频次增加,其潜在的冲突烈度也对国际安全构成愈发严峻的威胁。在此形势下,危机管理尤其是大国间危机管理变得极为必要,而威慑是否仍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发挥正向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

收稿日期:2025-07-07

作者简介: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国际战略、地缘政治与美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重点项目(2022-SKJJ-B-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

“危机”一词源自拉丁语医学术语“krisis”，意为“疾病的转折点”^[1]。在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看来，“危机”是“疾病的转折点，变化到来的时刻，结果是（个体）部分或完全的康复，或是疾病加重，或是死亡”^[2]。“危机”概念一出现，便赢得历史学家的青睐，被用以描述较长历史时段当中的某个特殊阶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用它描述一个国家（城邦）内部的政局异动，也将该词用于描述战斗或战争的某个过程^[3]。随着时间发展，“危机”开始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并被赋予不同含义。如今，“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惯用的分析前提，一种修辞手段，一个灵活有机的历史概念中的一个过程，以及一个连接各个学科的语言桥梁”^[4]。

根据权威定义，“国际危机”是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国际行为体因利益冲突而出现的决定性对抗，彼此关系由此处于高度不稳定、充满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当中^[5]。换言之，危机是国家间争端或冲突的一种形式，是四种国际关系状态当中较为独特的一种^[6]。在国际危机当中，通常一个或多个国际行为者明确或暗示将准备使用军事力量以实现其目标，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通常大大增加^[7]。如果国际危机不能和平解决，通常都会升级成为军事冲突，甚至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

作为国际政治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国际危机呈现出特定时期国家间根本性的紧张关系，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国际政治中的地震”^[8]。在危机中，涉及各方均持有或对外表现出拥有不惜使用武力捍卫目标的态度，直接引发彼此关系快速进入到高度紧张的互动过程中，相关国家也通常在较短时间内承受重大压力。其特征为，“正常的政治流程被突然打断、持续时间短、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上升，以及对国际政治中的某些系统（或关系样式）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9]。从这个

意义上讲，国际危机被视为改变或破坏国际体系现有平衡的危险转折点，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中间地带”，伴有极高的军事对抗和升级风险，时常是通向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梯^[10]。因此有学者认为，“尽管并非所有危机都会导致战争，但是所有的战争均源于危机”^[11]。

国际危机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或无意的，特别是意外事件的突然发酵。例如，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间的足球比赛，引发了两国关系急速恶化乃至危机。尽管两国在土地改革和劳动力迁移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突发事件的出现成为两国危机甚至最终爆发战争的导火索^[12]。但在多数情势下，危机往往是某国蓄意制造：一方为了升级既有争议，明知其举动将逾越对手设定的“阈值”，仍运用强制性力量以谋取竞争优势^[13]。美国学者勒博归纳了危机的三种类型，即“敌意正当化”“衍生品”和“边缘政策”，全部是一个国家决策者蓄意挑起或升级危机以求在紧张局势中获益^[14]。即使是偶然事件，也有可能被个别国家视作机会，主动挑起或升级危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危机”，德国决策者（无论是行政还是军方最高领导人）目的在于利用这一危机为德国对法俄两国开战提供借口^[15]。由此，部分西方学者用中文“危机”一词中“危”和“机”的喻义来描述各当事方面面临的复杂情势及可能获得的不同战略后果^[16]。

国际危机通常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冲突风险抬升或军事力量介入，涉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和国家间正常互动模式的重大变化，当然会对国家间的和平与安全、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秩序和全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很多场景下，国际危机呈现为两个或多个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过程，而每个竞争对手都试图升级其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回应对方的行动^[17]。考虑到危机内生的突然性、不可预测性及其升级后引发的严重后果，管理国际危机、防范危机出现“升级”，即防范各参与方彼此冲突强度或冲突范围的增加，超过一

个或多个参与者认为重要的“阈值”，使得危机最终转化成为战争，就成为各国决策-战略学界关注的焦点。而管理危机的核心，即是在特定的危机场景下，能够在更好保护自己核心价值和利益与避免升级为战争之间取得大体的平衡^[18]。冷战时期，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核大国“相互确保摧毁”（MAD）能力出现后，如何防范美苏两国间的普通危机越过阈值升级成为战争，甚至是核大战，成为经久的热议话题之一。因此，在冷战时期，危机管理被认为具有极端重要的国际安全意义。

二、作为危机管理方式的威慑

面临多变的国际安全局势，“危机管理”是限制和控制重大国际危机的升级的重要手段，成为冷战以来各国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学界所关注的重要国际安全议题之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国际危机的不同阶段当中，危机管理的重点各有不同。一是在所谓“前危机阶段”，即“信号检测、危机预防和危机准备”阶段，危机管理的目标是降低可能造成危机的风险，并在战略和战术上做好准备；二是在“危机阶段”，危机管理重点应当是“危机识别”和“危机遏制”，其中关键在于“反应、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以及组织如何处理危机”；三是在所谓“后危机阶段”，重点则是组织评估危机处理的效果及检讨危机处理的不足。

作为一种战略类型，威慑是通过向现实或潜在对手展示己方的实力和意图，使其明确意识到采取特定对外行为（特别是对外发动武装攻击）的风险远超出可能的收益，从而迫使其不得不放弃早先的企图^[19]。根据战略学家施奈德的表述，与“胁迫”或“威逼”相比，威慑就是“劝止的力量”^[20]。成功的威慑通过向对手展示出足够可信的能力和惩罚报复的意图，从而向对手灌输并使对手接受这样一种信念——如果对手拒绝服从并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己方将给对手造成极大的伤害，这种观念使对手被迫放弃拟议的行动以避免承受这种伤害。学界已细分出包括“直接威慑”

和“延伸威慑”，“惩罚威慑”和“拒止威慑”，“战略威慑”和“常规威慑”，以及针对更小规模冲突的威慑等不同类型的威慑，且不同类型的威慑亦分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及与之相配套的手段和资源^[21]。根据美国战略学家基辛格的归纳，所有成功的威慑必须兼具以下因素：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让潜在的侵略者估计到以上两点^[22]。

战略学界之所以高度评价威慑战略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正在于威慑被认为能够在影响对手决策中发挥有效作用^[23]。尤其是在“危机预防”或者“危机遏制”阶段，威慑战略被认为是能够影响对手决策，进而防止危机爆发特别是“劝阻”对手蓄意升级危机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在所谓“前危机阶段”，特定一方采取威慑战略，通过展示己方的实力及意志，使对手相信采取单方面升级行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改变其成本-收益计算估计，从而放弃拟议当中的引发危机的尝试^[24]。若威慑失败、危机爆发，那么在“危机阶段”，特定一方通过进一步增强其威慑能力或更有针对性地调整威慑策略，使对手愿意采取接触方式管控风险并放弃采取进一步的挑衅或攻击行为，这便有助于防止“危机升级”，降低双方直接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危机方一般会公开阅兵或进行军事演习，并向外界尤其是对手展示己方的军事实力，同时辅以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官方声明以解释其政策，尤其是画出“红线”也即给出“阈值”，概述其核心利益以及以威慑名义采取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利益，借此阻止对手升级危机^[25]。受到上述理论及部分国际政治实践的鼓励，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威慑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作用被部分西方国家战略学界推崇至极，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管理其与苏联之间若干级重大危机，成功防止两国爆发战争的主要做法之一^[26]。

当然亦应承认，在真实的国际危机当中，成功进行威慑进而阻止危机升级实际面临诸多困难，原因之一在于“阈值”并不明确。也就是说，

威慑发起方所提出的“阈值”或者画出的“红线”，由于交流渠道不畅通、文化差异、误读误判甚至偶然因素的干扰等原因，并没有使对手清晰认识到己方的意图，更遑论得到其承认和遵循。在这种情况下，对手或未发现，或虽发现却因其他考量仍执意推进，从而低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危险代价，进而导致局面滑向国际危机；或是在危机阶段，导致危机升级和武装冲突的爆发。国际政治实践中此类案例屡见不鲜，原因之一就在于，所谓“阈值”系主观产物，且严重依赖对方的认知。现实中，对方并不总是清楚威慑一方政策宣示以及威慑行动背后的确切意图。

由于威慑旨在影响并改变对手故意突破“阈值”的决策，因此威慑只能对蓄意升级发挥作用。若危机升级源于偶然事件或对手的无意举动，威慑就无济于事。从危机管理视角出发，在此情况下，显然需要运用不同的策略，以最大限度降低危机无意或意外升级的风险。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考虑到危机所涉及的另外一方常难以充分预估其行动后果，因此需要通过设置“红线”来进一步明确升级的“阈值”，并通过有效的沟通，使其清楚认识到此点，这对于防止意外升级至关重要^[27]。

不仅如此，一方提高其威慑可信度之举，可能在无意中为引发乃至升级危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如同“战争边缘政策”，一方发起威慑行动、向对手显示实力之举，如在有争议的边界附近驻扎部队、派遣舰队前往争议海域展开实弹演习，虽然目的是向对手发出“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否则将面临打击”的信号，但有可能激怒对手，进而触发危机升级。如果威慑一方认为既有威慑手段已无法有效阻止对手，或者对手对己方现有的威慑行动不以为意，并继续采取威胁性行动的话，那么威慑方可能会考虑升级手段。例如，当一方认为常规威慑之举已经失效时，则可能通过采取有限核选项等方式来升级威慑，从而导致现有的国际危机向核危机的转变和升级。

需要关注的是，威慑的目的在于迫使对手按

己方意图行事，而非部分西方学者所称的“维护和平”。因此，如果威慑发起方的目的在于压制对手、维持对己有利的局面的话，威慑行动只能被视作发起方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甚至在不少案例中，威慑发起方的真实意图为激怒对手，威慑行动宛如“向公牛挥舞的红布”，成为发起方有意制造危机，或危机出现后蓄意升级危机的工具，届时威慑不仅不能被视作管理国际危机的有效途径，反而成为挑起或激化危机的祸首。近年来最典型的案例当属俄乌冲突：2014年起，美国反复宣称将坚定威慑俄罗斯采取针对乌克兰“可能的入侵行动”；尤其是在2021年下半年，拜登政府高官不断公开俄即将发动战争的“证据”，组织北约诸国在乌境内及周边频繁组织军事演习，并公开对俄提出密集警告。此类威慑行动，实质上激化了原本便已紧张的安全局势，并最终导致危机的升级、失控和冲突的爆发。

三、美国的危机管理经验

美国应对和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高压政策引发其与殖民地关系迅速恶化，尤其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后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殖民地一方决心走向战争。独立建国后，美国历史上较为典型的国际危机包括：19世纪初，由于英国禁止美国对欧洲贸易、扣押美商船和强征美水手所引发的两国危机；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并要求加入美国所引发的美墨关系危机；南北战争期间，美联邦政府与英国围绕“亚拉巴马号”巡洋舰爆发的双边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与德国围绕关税、委内瑞拉、萨摩亚、“卢西塔尼亚号”邮轮、“齐默尔曼电报”等事态所接连出现的双边关系危机；1940年，美国对日本的不断升级的禁运所引发的美日关系危机；等等。总的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大概率上最终转化成为战争，危机管理在很长时间内未受到美国决策界的足够重视。

冷战期间，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危机在数量、

频次乃至危险程度上均远远超出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在传统的大国竞争模式上叠加出全新的危险与机遇^[28]。在战后初期全面垄断核武器情况下,美国在危机问题上,主要以强制方式,以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为代表,主动制造甚至升级危机,以求在己方拥有巨大实力优势(尤其是核优势)的基础上,逼迫对手让步,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明显拥有全方位军事优势情况下,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实际上采取利用军事手段主动升级的方式,以压迫对手作出战略性让步,为此甚至不惜直接爆发军事冲突^[29],实质就是美国决策者力图通过挑起和利用危机以求实现其目标。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著名表述就是,“为了保持和平,需要主动走向战争边缘”^[30]。

随着苏联原子弹、热核武器相继研制成功及运输投掷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战后维持时间不长的核垄断局面被完全打破。尤其是随着美苏两国“恐怖平衡”的出现和两国均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美国在处置与苏联的国际危机时,实际上开始放弃“战争边缘”等主动挑起危机或是主动升级危机向敌方施压以求最大程度谋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路径,而是采取了较此前显然更为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诸如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等可能直接引发美苏直接武装冲突甚至核大战的重大国际危机时,美国开始试图在显示己方能力和决心以最大程度争取战略利益同时亦不至于引发美苏核大战这两条道路之间寻求平衡。正是在此类危机的直接刺激下,美国战略学界亦逐渐发展起一套有关国际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以求为这个复杂微妙同时危险重重的决策过程提供理论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在核冲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美国学术界所发明的诸多特定概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危机管理

理论及实践中,威慑被认为是防范危机升级,即实现“危机稳定”最为有效的战略方式之一。具体而言,在涉及核心战略利益时,美国需向危机另一方保持并展示出强大的(战略与常规)威慑力,使对手认识到蓄意升级可能带来的好处将无法弥补其损失,进而放弃拟议当中的进一步行动,就此化解危机。当然,考虑到核冲突甚至核大战的恐怖后果,如果危机并不涉及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亦可通过谈判沟通了解对手的要求并且设法与之妥协,即采取“绥靖”政策,使对手不再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使危机降级甚至平息。总体而言,上述两种路径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危机管理中均得到了印证。

以威慑应对国际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当属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发现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武装封锁古巴。美国海军出动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在内的约200艘战舰组成海上封锁线,沿以古巴东北端迈西角为中心、半径为500英里的圆弧进行部署,拦截并强行检查前往古巴的舰船;美战略空军司令部首次将戒备等级提升至DEFCON 2,濒临最高警戒线;多型战略轰炸机开始疏散并随时准备出击,洲际弹道导弹进行警戒部署;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开始集中;美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戒备状态^[31]。在美国展现出的强大军事实力及“坚定意志”面前,苏联最终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而威慑也由此被视为美国“赢得”此次危机最为得力的工具。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代表,归因于在诸多重大国际危机当中不断取得的“成功”,威慑在整个冷战期间已经成为美国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的核心要素,成为美国应对国际危机的首要方式,被视作可以在避免爆发冲突的同时最大限度确保美国利益的有效仰仗。不仅如此,威慑战略还被认为有助于维系美国的国际威望。根据威慑的逻辑,美国自称为一支维持现状和防御性的力量,“无意于”获取新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其武装力量存在

和运用（尤其是毁灭性巨大的核打击能力）并不在于改变现状，而只是用于“阻止侵略”和“吓退”敌手的可能攻击。这一解释不仅为其规模庞大的核武库和常规武装力量存在提供了“足够正义”的理由，甚至配合并有助于不断“妖魔化”敌手的努力^[32]。正是在所谓“成功经验”鼓励下，冷战结束后，威慑战略同样被视作美国管理国际危机并且从中获益的有效借助。这一点，在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历届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及《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体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若干次重大危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受特定时段内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因素突出增长的影响，中美关系曾数次呈现出高度不稳定状态。在诱发中美两国爆发危机乃至导致危机升级的诸多因素当中，台湾问题一向扮演着最为重要的变量。包括第一次台海危机（1954—1955）、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第三次台海危机（1995—1996）在内，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甚至近乎兵戎相向的最大诱发因素。在这个关系重大而异常危险的过程当中，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也一直宣称将“威慑”作为其“危机应对”的主要方式。

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奉行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多次指责“中国决意要占领台湾”而非仅限于沿海岛屿。为此，美国不仅紧急调动包括5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战舰驶向邻近水域以对中国显示其威慑能力，同时美政府高官亦不断对外展示其威慑决心。国务卿杜勒斯就反复声称，将对中国“针对‘福尔摩萨’的行动”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使用核武器”^[33]。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军派出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作战舰艇进入台湾海峡，甚至为国民党船只提供武装护航，同时亦频繁对华喊话，重申其“保护台湾决心”并要求中国大陆停止军事行动。1995年至1996年，在台湾当局首次举行所

谓“总统民选”、台当局“台独”倾向公开化直接接触发台海危机（即所谓“第三次台海危机”）后，美国为“阻止”中国大陆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派遣“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附近水域展开战斗巡逻，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在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实力展示^[34]。同时，美官方高调宣称“为保卫台湾不惜动武”，显示对台湾当局的支持，试图通过武力威慑中国大陆放弃针对台湾的“武力”行动。

正是在上述经验鼓励下，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美国依然主要通过威慑战略以求“维持台湾地区现状”“消除危机”及“在危机出现后防止升级”。方式就是通过向“第一岛链”及邻近区域（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甚至越南）不断增加部署美军预警、防空、反导、反舰和反潜武器系统，甚至在关键地域增派地面部队，同时强化与台当局的军事合作，试图以费用相对低廉的方式，大幅提升中国大陆展开军事攻击的风险和成本，威慑中国大陆可能的“激进企图”。为显示其威慑决心，近年来美国频繁以军舰穿行台湾海峡、军机抵近侦察、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强化对台军售、政府高官访台等行动，甚至以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战略兵器公开展示等方式，提升其在台湾等问题上对华威慑的“可信度”。上述行为方式，已成为美国在诸如1999年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2022年美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等引发地区紧张形势时的首要应对方式，甚至已成为美国采取战略性行动的“日常”。然而，在此过程中威慑战略所发挥的真实作用和实际效果却从未得到美国决策界乃至战略学界认真评估^[35]。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在新的安全环境中，尽管威慑战略在国际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更为复杂，但美国依然坚持将威慑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方式。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势力”和“战略竞争

者”，对华全面展开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以“全政府”方式推进“印太”战略，在外交、经济、科技和军事安全等领域对华全面施压。2021年，美国推出“一体化威慑”概念，试图将此作为对华政策甚至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石，以求在技术发展和权势对比较大幅度调整背景下确保其战略利益^[36]。与传统的单一威慑模式相比，所谓“一体化威慑”战略，是将常规威慑、核威慑、新兴军事领域（如网络、外空、深海、人工智能、无人系统、高超声速武器）威慑融为一体，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如贸易、金融、信息），联合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日本）和伙伴国，从所有领域和多重维度，以联网交织的方式，置敌于多重困境，强化威慑效力^[37]。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在既定问题上的威慑战略正面临愈发难以克服的难题。就威慑能力而言，早在21世纪初，便有美国学者称，中国不断加快的军事现代化不仅全然改变了海峡两岸的军事平衡，甚至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也正在面临不断增大的挑战。“美国的威慑能力日益下降，其在台湾冲突中胜出的能力可能在2030年前就已经消失。”^[38]在美国威慑可信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的同时，其介入台海危机的意愿即“威慑决心”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一个对多边主义及其同盟体系抱有高度怀疑态度的美国，是否仍具备一旦危机爆发便果断派遣武装力量迅速介入、以阻止危机升级为战争的意愿，甚至不惜冒愈发增加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的风险，这一点也正在引发普遍怀疑^[39]。

四、结语

在很大程度上，“危机管理”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主要源自美国独特的国际政治经验。当然，这个概念体现出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精神，例如，对管理、控制、流程等概念的高度信任，以及基于理性行为隐含或明确的假设。因此，自出现之时起，危机管理概念便成为美国战略文化中一种持久的本能^[40]。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古

巴导弹危机之后就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有所谓战略之类的东西，而只有危机管理”^[41]。总的来看，危机管理可以被理解为包括预防性外交、威慑、有限战争等在内的一系列彼此联系的概念组合当中的关键概念，尤其是与威慑战略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后者甚至直接被视作危机管理的主要方式。危机管理目标在于消除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尤其是防止其升级为战争），同时保护己方的核心利益；而威慑的目标在于阻止敌手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维持现状就是自身的利益所在。而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威慑信号的释放非但不一定促使局势降温，反而可能成为危机新一轮升级的催化剂。

总的来看，近年来美国在亚太等地区的威慑行动，实际效能令人质疑。在地区军事优势即将或已经出现重大转移的背景下，美国依然将其在亚太地区长期进行的以“维护现状”的武力示威行动作为针对中国的总体战略施压的主要手段。这种浸透着冷战思维，僵硬且挑衅性极强的行动方式，不仅无助于消弭国际危机，反而其自身已经成为国家间危机的直接促生者。其后果是，近十年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东海、南海，特别是台湾海峡）军事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陡然上升，已成为激化地区安全局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美国一味固守其长久以来的教条，继续派遣海空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开展所谓威慑行动，而不考虑地区其他主要大国的核心利益及真实感受，那么中美之间爆发重大危机乃至危机快速升级的可能性将愈发增大，两个核大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风险也将随之持续放大。其后果不仅会对地区内国家和整体安全形势造成直接冲击，而且还将对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形成前所未有的重大甚至致命性挑战。

对中国而言，应对美国在地区范围内异常顽固的威慑行动及其背后体现出的僵硬思维，尤其是有效管理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危机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面强化反介入、反干涉能力，通

通过各种方式清晰阐明我方在地区重大安全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阈值”，使美方充分认识到我方坚定意志，即便面临与其他干涉方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也以坚定的反威慑、反介入措施，促使美国打消通过故意触发并主动升级危机而从中获益的企图；另一方面，须审慎评估中美双方战略利益所在，深入研判美方的升级“阈值”及可能行动，评估我方突破美方心理预期，主动升级危机所能够承受的代价，并在必要时主动试探美方“阈值”，通过可控的危机升级削弱其威慑可信度，从而迫使对手在核心问题上作出战略性让步。

参考文献：

- [1][12][18][25][26][27]The Hague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Back to the Brink: Escalation and Interstate Crisis[M]. Hague: HCSS, 2016: 17、27、13、46、44、46.
- [2] Etymonline. Origin and History of Crisis[EB/OL]. (2025-06-03).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crisis>.
- [3][4] Randolph Starn. Historians and Crisis[J]. Past and Present, 1971(1): 34、22.
- [5] David A. Welch. The Ontolog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EB/OL]. (2021-02-23).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display/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1569>.
- [6] Notre Dam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enter. Crisis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B/OL]. (2023-02-27). <https://ndisc.nd.edu/news-media/news/crisis-manage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 [7] Phil Williams. Crisis Management: Confront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M].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CO.Ltd., 1976: 1.
- [8]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arthquake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1.
- [9] Oran R. Young. The Politics of Force: Bargaining during Superpower Cris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
- [10] Glenn H. Snyder,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
- [11] Michael Brecher,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7.
- [13] Forrest E. Morgan, David T. Orletsky, Ryan Henry. Confronting Emergent Nuclear-Armed Regional Adversaries Prospects for Neutralization, Strategies for Escalation Management[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5: 29.
- [14][29][41] Richard N.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7、58、266.
- [15] Fritz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M].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9: 682-738.
- [16][23] Khaled Zamoum, Tevhide Serra Gorpe. Crisis Management: 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Approach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oday's Crises[C]. Katarina Holla, Michal Titko, and Jozef Ristvej. Crisis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Intechopen, 2018: 207、205.
- [17] Forrest E. Morgan, Karl P. Mueller, Evan S. Medeiros. Dangerous Thresholds: Managing Esca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8: 9.
- [19][24] Henry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M].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1957: 96、96.
- [20]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9.
- [21] Alexander L. George,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52.

- [22] 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M].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8.
- [28][40]Phil Williams.Crisis Management: the US Approach[C].Carl G. Jacobsen.Strategic Pow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S.S.R..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191、191.
- [30] Sara Aldworth, John Foster Dulles.the Cold War Architect[EB\OL].(2020-03-10).<https://www.acton.org/publications/transatlantic/2020/03/10/john-foster-dulles-cold-war-architect>.
- [31] 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M].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4.
- [32] 葛汉文.“吓退敌手”:威慑战略及其在大国竞争时代的运用——基于美国经验的若干思考[J].战略研究,2023(2):21.
- [33] Gregory Kulacki.Nuclear Weap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Part I[J].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2020(2):334.
- [34] Douglas Porch.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J].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1999(3):15.
- [35] Maximilian Hoell.Escalation, De-Escalation, and Intra-War Deterrence[M].Livermore: Center for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2024:2.
- [36] Dinair Alves. ‘Integrated Deterrence’ is Cornerstone of U.S. Defense, says Defense Secretary[EB\OL].(2021-05-03).<https://www.defenseforces.com/2021/05/03/integrated-deterrence-is-cornerstone-of-u-s-defense-says-defense-secretary/>.
- [37] Pentagon Seeks New Ways to Deter China in Defence Strategy[EB\OL].(2021-12-11).<https://dailyasianage.com/news/277743/pentagon-seeks-new-ways-to-deter-china-in-defence-strategy>.
- [38] Brendan Taylor.Dangerous Decade: Taiwan’s Secur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EB\OL].(2019-09-27).<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adelphi/2019/dangerous-decade/>.
- [39] Kristen Gunness, Phillip C. Saunders.Averting Escalation and Avoiding War: Lessons from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risis[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22:4.

责任编辑:尔东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逻辑理路

谢欣桦 邓显超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表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时代产物,包括统摄指导话语、基本前提话语、价值立场话语、目标使命话语、方法论话语、传播交流话语。从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自信自立的主体根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理实结合的内在要求、文明互鉴的高远境界等层次着手,话语间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呈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系统论证。这一话语体系具有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体系特质,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逻辑理路

202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此后,从话语维度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通过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统摄指导话语、基本前提话语、价值立场话语、目标使命话语、方法论话语、传播交流话语,进一步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逻辑理路,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系统论证。

一、统摄指导话语: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

统摄指导话语是指对多个概念、观点、现象进行统领、整合和概括的话语,具有高度的抽象

性、概括性和综合性,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整体关系。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居于统摄保障地位的系列话语,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达,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

收稿日期:2025-05-15

作者简介:谢欣桦,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邓显超,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影响力提升的话语叙事研究”(24BKS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话语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发展观为这一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文化实践观为这一话语体系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路径，认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富足”^[2]。文化交往观则为这一话语体系描绘了文明发展的宏伟蓝图，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这些创新性话语论述，不仅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要义和理论实质，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话语原则与立场。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各方面、各环节的话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最大底气，相关话语构成了统摄和保障话语体系的核心。新时代以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交往逐渐转变为全域性世界交往，世界文化日益趋近于马克思所预言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4]。这一趋势引发了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多元化、多变性的发展态势。

新形势下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和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凝练出一系列创新性话语要点。例如：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话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关于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路径与策略话语，强调“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6]，“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7]，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8]。

概而言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在文化

交锋、话语交流中强化战略思维和保持战略定力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的根本策略。

（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理性判断与深邃思考。其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便是这一话语体系中经历史和实践反复确证的重要话语构成。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改革发展稳定的复杂局面以及媒体格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9]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这一论断不仅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也推动了相关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

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相关话语重点、话语条件、话语举措、话语保障。就话语重点而言，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发展的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来源，是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从民族进步层面来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从社会和谐层面来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就话语条件而言，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1]。就话语举措而言，强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2]。就话语保障而言，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

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4]。

二、基本前提话语:自信自立的主体根基

基本前提话语是指在特定语境或讨论中,作为其他话语或观点的基础和前提而存在的话语。这类话语通常为后续的交流、论证和讨论提供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前提话语,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精神独立自主、巩固文化主体性,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的主体根基,并从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角度系统展现文化强国建设的支撑力量。

(一) 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先导性话语前提。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建设和文明进步的前提,代表着更为根本、更为广泛、更为深厚的自信,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由此形成的话语体系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5]

从话语发展脉络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首次使用“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此后,关于“文化自信”的相关论述愈发丰富,概念日臻完善。例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中,分别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6]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7]的要求。系统来看,文化自信话语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更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立足点。

(二) 坚持精神独立自主

坚持精神独立自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

系中的基础性话语前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8]独立自主不仅涵盖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更深及精神领域。精神独立自主一般指,主体具备自我主张、自我决策、自主思考和自立自强的能力,拥有坚定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自信,不依赖客体认同和支持来维系自我身份与价值认同的思维方式和意志品质。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进入新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思想、精神、价值等领域的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多向。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精神独立自主的重要价值,凝练出一系列标识性话语,从精神层面回应了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必然性。在谈到精神独立自主的价值意义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19]在论述精神独立自主的实践举措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0]在探讨否定精神独立自主的后果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21]上述话语进一步阐明了精神独立自主对掌握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三) 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战略性话语前提。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必须将文化主体性提升到战略层面,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层面的持续性主动。从深层次来看,文化主体性是指在对外来文化的交流、交锋与融合中,保持自觉自省,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出文化内生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话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围绕政党、国家、民族三个层次构建起来的。在政党层面,文化主体性与政党主体性相辅相成,二者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孕育而生。在国家层面,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主体性相互依存,二者均通过“两个结合”得以发展,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深厚根基上的主体性表达。在民族层面,文化主体性与民族主体性相济相生,二者均在“文化生命体”这一整体性范畴下凝聚为共同体概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下论断:“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2]

三、价值立场话语: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价值立场话语是指在表达观点、阐述主张或交流探讨时所基于的价值取向、立场和观点的话语,反映了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价值立场话语,即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人民是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和最终评判者,有助于解答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基础性问题,并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个话语体系。

(一) 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

“文化发展为了谁”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化、大众的文化。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3],并进一步阐释说,“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4]。

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以贯之地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鲜明主线,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创新性话语。在论述文化建设的基本导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25]。在谈到文化的价值意义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26]。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文化为人民服务”系列话语,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多维视角,解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27],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人民立场的话语自觉。

(二)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文化发展依靠谁”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8]。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9],“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30]。从深层次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其实质是将人民主体力量视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民凭借自发性和能动性持续创造的结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贯穿于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部署中,形成了一系列标识性话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31],提倡“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32],明确“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33]。系统

而言,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三) 强调人民是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和最终评判者

“文化成果由谁共享”“文化发展成效由谁评判”是一个长远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内契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都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也进一步说明,将人民作为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和评判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关于“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34],强调抓好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35]。关于“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6]。这些论述明确了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更是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和最终评判者,从而进一步彰显了话语中鲜明的人民立场。

四、目标使命话语: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目标使命话语是指围绕目标和使命所表达的一系列语言、观念和表述,旨在阐述组织或个人的目标追求、责任担当以及为之奋斗的方向和意义等。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目标使命话语,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进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直接目标、战略目标、文明目标,有助于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标示文化坐标、锚定文明航向。

(一) 推动文化繁荣

推动文化繁荣指明了文化建设的直接目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视野下,文化始终被置

于治国理政的全局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37]此外,在新时代的时空背景下,“推动文化繁荣”就是要善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于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精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推动文化繁荣就是要“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38]。简言之,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就无法实现文化繁荣,更无从谈及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从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的战略规划来看,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话语事关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39]。在强国建设的战略安排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4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期待”^[41]。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形成的目标使命话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提供了基本话语遵循和目标指向。

（三）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文明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及“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深刻理解这一话语，既关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塑造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又关乎中华文明未来发展走向。从话语的实践进程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42]。从话语的基本意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凝练概括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项突出特性，为实现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鲜活话语意涵。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实现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相关话语揭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时代任务，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发展趋向，擘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发展形态及新发展图景。

五、方法论话语：理实结合的内在要求

方法论话语是指围绕方法论所展开的理论阐述和观点表达，对这一话语的掌握有助于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方法论话语，即践行“两个结合”、坚持守正与创新、把握明体与达用，在彰显理实结合的内在要求中，描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则。

（一）践行“两个结合”

践行“两个结合”是党在百年治国理政中形成的重要方法论，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由之路。这一理论所衍生的相关话语，揭示了党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规律认识和科学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通过对“第一个结合”话语的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真理性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彰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43]。另一方面，通过对“第二个结合”话语的系统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质，成为解决新时代文化发展难题的最大法宝。

“‘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44]。概言之，“第一个结合”的相关话语促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二个结合”的相关话语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塑造起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二）坚持守正与创新

坚持守正与创新内蕴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4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正创新的话语论述，揭示了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为守正注入生机与活力，二者均是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方面，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决定了文化创新发展的性质方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守，则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创新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合，推动二者由“彼此契合”的状态达至“互相成就”的结果，实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把握明体与达用

把握明体与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方法论。“体”指本体、本源、本质，“明体”就是要对事物的本质加以认识，进而把握事物内在的根本规律。“用”指作用、效用、方法，“达用”就是要将“体”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实现对其价值意蕴的复归。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明体”意味着推动文化理论观点的突破与创新，明确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本质规定和根本原则，构建起以“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文化自信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等为核心的话语论表达，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达用”意味着把握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构建起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为核心的话语论断，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路径、方式方法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既注重“明体”，又兼顾“达用”；既涵盖文化理论上的创新话语，又包含文化实践上的部署话语；既指涉“为什么”的宏观话语层面的整体指导，又面向“怎么办”的具体话语层面的践行举措，生动展现了这一话语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六、传播交流话语：文明互鉴的高远境界

传播交流话语是指在传播过程中，主体为了实现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等目的所形成的观点表达和话语概述。从国际交往层面来看，这一话语同国家形象塑造和国家软实力发展息息相关。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中的传播交流话语，即塑造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助于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

在彰显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文明互鉴的高远境界，进一步呈现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的传播交流图景。

（一）塑造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视野下，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46]。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在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过程中，凝练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话语概述，既为全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外部条件，又凸显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彩，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标识性话语，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47]。如在对外宣传上，我们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叫不响”的尴尬境地，因而我们越来越注重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相关话语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从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到促进文化交流再到增进文明融合，最终达至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关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话语,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精深的话语智慧和坚实的话语支撑。

(三) 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8]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理念,将对本土文明的再造与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思考有机统合,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话语。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9]。所形成的文明话语区别于“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隔阂论”等文明话语,其主张文明平等和尊重,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博大情怀,致力于通过不同文明间的普遍交往和深层互动,化解由西方中心主义所引发的文明冲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构多元文明图景,助力不同文明之间建立贯通枢纽,实现话语共鸣、精神共情、文明共振。

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聚焦于文化道路、文化理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和文化力量,以及贡献给世界的文化方案和文化智慧,贯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理念、路径策略和原创贡献^[50]。分析其逻辑理路,可以从话语体系内部的统摄指导话语、基本前提话语、价值立场话语、目标使命话语、方法论话语、传播交流话语等方面加以梳理。各层次的话语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生发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的现实实践,指向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论证深刻、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必将随着实践

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为不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工作、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更为科学的话语引领、更为高效的话语指导、更为理性的话语方案。

参考文献:

- [1][4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3、553.
- [2][5][6][7][8][19][30][41][4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4: 24-25、12、16、17、18、46、80、5、27.
- [3][9][12][13][15][17][31][35][36][4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95、36、36、479、35、37、289、289、20.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4.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0.
- [11][16][29][32][4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4、32、139、313、468.
- [14][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6、67.
- [20][22][42][44][45][4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0、9、9、7、11、12.
- [21][25][27][33][34][38][4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19、261、248、249、244、84、70.
- [23][24]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57、863.
- [26]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4 (20): 12-13.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95.
- [3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

- 出版社, 2020: 309-310.
- [39] 习近平.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J]. 求是, 2025(8): 4.
- [50] 谢欣桦, 邓显超.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和呈现样态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1): 79.
- 责任编辑: 杨玲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理论内涵、现实问题及实践进路

谢 波 李子轶

摘 要：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意义重大。从方法论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分别表征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改造式创新、丰富式创新两类方法；从时代话语看，推进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涉及文化精髓汲取、文化主体性巩固、创新空间开拓等关键议题。当前，推进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面临文化资源整合、守正与创新关系把握、内容与形式相契合以及传播的可接受性等现实问题。在实践进路上，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在充分挖掘文化中的安全因子、科学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更好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逐步形成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等方面综合发力，有效推进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安全

202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着重对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中赓续中华文脉作出指示，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1]。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

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两创”理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是推动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是中国历朝历代安邦定国过程中实施军事活动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实践经验之总结与提炼，对今天开展军事斗争及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

收稿日期：2025-03-15

作者简介：谢波，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李子轶，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演进与周边关系研究”（LSYZD21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要价值。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能为更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战略指导,又能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奠定理论基础。为此,本文着重阐释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的理论内涵,分析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实践进路。

一、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的方法类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3]贯通历史与现实,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进行“两创”,既能丰富安全理念的时代内涵、拓展价值追求的多元维度,为其注入鲜明的当代特质;又能为应对复杂风险挑战提供智慧借鉴,为把握发展规律找寻历史经验支撑。而“两创”则分别表征着改造式和丰富式两种创新方法。

(一)“创造性转化”的改造式创新

创造性转化实质在于以创造性思维思考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新时代之新要求,其更加注重“继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战略基点,挖掘和解读其核心价值和思想精髓,并在新时代语境中重新诠释和表达,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与变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首先要明确转化之根本目的,即服务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现实需要。然而,受限于时代背景,传统战略文化中的观念和理念往往难以直接适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只有在保留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结合当今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多维需求和复杂环境,将传统理念有效转化为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素,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战略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作用,为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独特的文化支撑与战略思维。

创造性转化主要包括“形式改造”和“领域迁移”两种方式。所谓形式改造,是在保留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核心内容和精神基础上,对其表现形式、传播方式、结构及符号体系等进行调整、

创新和转化,使其更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例如,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表达出和谐共存的观念,强调在保持差异基础上,实现事物的和谐统一。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主权国家的建立,我们对“和”的表现形式进一步改造,延伸到国家间的交往,这无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契合。而领域迁移则是从传统战略文化中挑选出具有普适价值和持久影响力的优秀部分,并将其应用于不同领域。这种借鉴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战略文化精髓基础上,结合该领域自身特点和需求,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为不同领域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经典论断,不仅是古代军事领域的制胜法则,其蕴含的辩证思维与战略智慧,对统筹新时代国家安全各领域建设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以政治安全领域为例,“知彼知己”意味着不仅要充分了解本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明确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方向,也要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变。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制定明智的政治策略,更好地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主权独立。

(二)“创新性发展”的丰富式创新

与创造性转化不同,创新性发展更聚焦于突破与超越,即基于现有资源、技术和制度框架,借助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思维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以积极主动的前瞻视野,着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系统性、深层次的拓展与丰富。除前瞻性外,创新性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多元性,既体现在思想理念和实践方法的丰富多样上,更通过科技赋能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主要途径有“概念重塑”和“功能拓展”两种。所谓概念重塑,就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行时代化改造,在不偏离原意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扩展。例如,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贸易通道,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

流与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既延续了古丝绸之路的要义，但又不止于此，不仅包括商品、技术等交流，更注重构建全方位、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而功能拓展的核心在于打破固定单一领域的局限，实现应用场景的延伸与扩容。在对待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资源时，要以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不断向外拓展其应用范围。例如，在中国古代，“密信”“密码符号”等被广泛用于军事传信和外交往来，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信息编码处理，确保信息的机密性和安全性。根据这一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将传统密码学应用于现代网络安全技术中。

二、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的时代话语表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与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密切关联，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一）文化精髓之汲取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不仅为当代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为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智慧参考；其内涵不仅限于战争和军事战略的范畴，更蕴含治国安邦的“整体性思维”^[5]等核心要义，这些智慧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在战略思维层面，“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关键在‘总体’”^[6]的理念相呼应，均重视从整体出发进行分析和决策。因而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树立全局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系统性考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因素。在价值理念层面，传统民本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7]一脉相承，均以保障人民福祉为核心。因此，立足现代安全

环境的现实需求，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汲取智慧，对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危机应对方法及安全稳定追求进行“两创”，不仅为宏观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也能在具体操作层面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这些深厚的文化精华为新时代国家国防线的构筑、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

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明滋养^[8]。基于此，一是要做好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相关经典名著的解读。这既包括《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也涵盖《论语》《孟子》等经典中与战略思想相关的内容。在解读文献过程中，要关注其所处历史背景，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精准把握思想生成的深层逻辑。二是要做好相关内容的筛选。因时代限制，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难免存在与新时代发展要求不相契合的成分，必须建立科学的筛选标准。一方面，应明确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发展趋势，精准识别传统战略文化中具有现实适配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结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筛选出与之相契合的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整合出与当代社会需求相适配的战略文化资源。

（二）文化主体性之巩固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中华文明建设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之核心要义，亦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发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可从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内核主体性、文化方法主体性三个层次理解^[9]。

文化建构主体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自主进行价值选择、创造和传承，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中国传统

战略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内生性观念,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战略文化中以扩张与竞争为主导的观念。正是这种内生性价值取向,使中国在战略理念构建过程中避免被外部战略文化所同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某些别有用心国家往往试图通过传播其意识形态来影响我国的政治走向。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将极易导致本土文化式微和文化安全危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在我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一方面,它决定着国家的政治方向,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破局的最佳方案;另一方面,作为文化领域的核心引领,它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价值坐标,也为增强文化自信铸牢思想根基,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内核主体性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发挥决定性和根本作用的核心要素。其内涵包括:一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不仅构成文化之核心,也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蕴含着独特而深刻的审美标准,不仅体现在对军事战略和战争艺术的高度智慧中,亦反映出对和谐、平衡与整体性美学价值的追求;三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传统习俗。这些内涵既是文化传承之重要载体,又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不仅有助于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使民众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形成一致立场,防范文化渗透,而且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使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实践意义。

文化方法主体性强调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文化背景,灵活运用适合的文化方法。这种适应性能帮助国家更好应对外部挑战和变化,保障国家安全。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了科学理论框架和方法指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和文化土壤。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应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对不符合时代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的内容,要予以摒弃,避免其阻碍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敬畏之心传承文化精髓,守住其独特基因与核心优势;更要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意识——通过与当代社会现实需求相对接、与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融合、与现代科技进步相赋能,推动传统战略文化实现创造性跃升。

(三) 创新空间之开拓

不断开辟创新空间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实现“两创”的关键目标和实现路径。其中,传播方式创新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得以有效推广的关键。随着数智时代到来,传播手段需采用更加动态、互动和多样化的形式。通过构建多层次信息传播体系,以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多渠道途径,使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以更具生动性、直观性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同时,在传播过程中需注重理论内容的通俗化,结合多媒体技术实现可视化表达,使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更好地引起公众共鸣并融入社会意识。

除传播方式创新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教育方式需同步创新。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教育也应顺应这一趋势,采用更具创新性和互动性的教学模式。在教育内容的设计上,应更加注重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现实相结合,增强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采用更具互动性的教学手段,同时健全完善教育体系,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氛围。

三、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形成于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但当今时代的变化必然使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现代化适应过程中面临现实挑战。

（一）文化资源的整合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10]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科技进步以及安全形势复杂化，不仅要继承传统，更需创新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方能使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和实际效用。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资源往往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和社会背景，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尚未形成统一框架。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作用并非易事。目前来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研究和梳理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导致其丰富的内涵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发掘和整理，甚至在评估其历史、文化和现实价值时，出现重复研究或者重要内容被遗漏的现象。此外，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评估和保存机制，部分资源在传承和保存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失真或流失的风险。正因如此，文化资源难以实现充分整合和合理利用，不仅无法为国家安全维护和塑造提供支持，甚至在面对外部文化渗透或国内文化安全风险时，会陷入应对能力不足、战略储备缺乏的被动境地。

（二）守正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1]守正表明对根本原则和精髓的坚守，创新则是突破传统、探索新的方式和创造新事物的过程，往往是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守正为创新提供基础。在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必须以其优秀战略文化资源为基础。如果创新的根基不牢固，那么围绕这个基础所进行的创新不过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守的“正”是以过去的形态存在的，如果一味守正而忽略创新，那么就算有再优秀的战略文化资源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通过两者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既能维持自身独特性，又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变化的时代需求。

然而，在守正与创新的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譬如，传统战略思想与现代战略需求之间存在天然的适配性差异。古代战略文化受制于生产力发展，其关注的视野往往带有局限性——多聚焦于军事、政治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则较为容易忽视。而当今世界的竞争已演变为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有效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就必须重视多领域安全之间的关联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持续性三个重要特征^[12]。如何做到兼顾“总体”，做好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向其他领域延伸适配，并形成有效指导，成为当前需要破解的复杂课题。

（三）内容同形式的契合问题

内容与形式契合度问题一直是文化创新的难点，对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存在一定距离，在“两创”过程中面临着形式创新度把握不够以及忽视文化语境的问题。因此，在其转化与创新过程中，如何在不偏离核心内容的前提下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

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创新性发展中，形式创新的过度或不足都会影响内容的表现力。过度创新可能会让内容过于“新奇”或“脱离实际”。受商业化和符号化影响，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可能被简化或重新包装，导致现代媒介呈现与传统内涵发生错位，掩盖其内在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从而使创新在理论上失去深度和广度。而形式创新不足则可能导致内容的传播力减弱；如果仅停留在表层，还会导致传统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被掩盖，失去应有的思想深度。这种缺乏实质内涵的创新只是流于形式的表层改造，既无法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也难以引起现代受众共鸣。因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

创新的关键在于找到内容与形式间的平衡点,使两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以实现价值最大化。

事实上,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历经几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忽视这一使用语境将导致与时代的脱节。战略文化并非孤立的文化产物,而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及民族精神密切相连,一旦转化过程脱离了这种背景,只关注当代的应用需求,那么创新往往会变得片面和失衡。真正的创新应建立在对文化背景的尊重与理解上,而非简单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机械结合。只有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涵,并在当代背景下保持其文化精髓,才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创新性发展。

(四) 传播的可接受性问题

在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过程中,传播的可接受性也应纳入考量范围。一是战略文化的表达多与古文典籍密切相关,现代受众可能会存在阅读和理解障碍;二是战略文化在内容呈现上偏向宏大叙事而缺乏具象表达,难以引发公众兴趣;三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内容偏差,如背离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等。

首先,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精髓往往体现在古代文献中,这些文献以古文写作为主,其语言的复杂性和表达的隐晦性,加之句法结构、词汇使用及语境与现代汉语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得现代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时常常面临挑战。如不了解背景知识,便难以准确解读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内核。这种阅读障碍不仅构成语言层面的挑战,还会对其有效传播和公众接受产生负面影响。许多读者在接触这些经典战略文献时,往往因对古文的陌生而浅尝辄止,进而可能造成对其内涵的误解,甚至导致对其价值的忽视。

其次,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许多思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导致其在传播过程中容易给人以抽象感。特别是在进行高度理论化阐释时,战略思想会显得缺乏实践指导意义,难以与当下国家安全问题形成有效的关联。这种现象使得战略文

化难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相比之下,公众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具体实在且与国家安全有显性关联的内容,而对这类看似宏大抽象的理论缺乏深入探究的意愿。

最后,传播方式与文化自身的核心价值取向相背离。为迎合现代受众的需求或适应市场化的传播方式,一些文化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被过度简化、商业化甚至娱乐化,导致其原有思想和价值观被扭曲、稀释乃至消解。这种背离使得传统战略文化在传播中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厚重感和思想深度,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四、推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的路径选择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继承,更是适应新时代背景、满足国家安全需求之最佳路径。这种策略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挑战,体现出综合性、立体式和全方位的特点。此外,“两创”亦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助力构建更为稳固和有效的国家安全防线,推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一) 充分挖掘文化中的安全因子

要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包含的安全因素充分挖掘,就要深入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内核,细致剖析其中蕴含的安全理念、策略及智慧元素。这不仅有助于拓展战略文化资源,而且能为现代国家安全战略理念的丰富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第一,需以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全面、系统、细致地梳理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首先,通过仔细阅读文献,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发展脉络形成初步认识;其次,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文献之间的异同,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战略文化的特点及演变过程;最后,通过综合归纳将分散的信息整合起来,形成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整体特征和规律的认识,最终构建系统的分类体系。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散见于古代军事家、战略学家、哲学家等的思想著作以及

历代王朝的实践中^[13]，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其内容丰富多样且意义深远。对这些文本的深入理解是做好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两创”工作的基础所在。

第二，立足现实重新解读。必须始终紧扣“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实践”这一根本前提，这一前提既是战略文化解读的实践基础，也为解读范围划定了清晰边界。通过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推动文化遗产统一监管与保护，更准确地评估和判断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内容的适用性与价值，进而筛选出合理且有益的解读成果，能够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有效支撑。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战略文化，也能确保在新的安全环境下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更加科学有效，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安全目标。

第三，在传播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其核心价值，确保传统战略思想在转化过程中不丢失其文化根基。同时也需警惕为迎合现代传播而过度采用娱乐化等表达方式，避免让文化传播陷入肤浅化、表面化的困境。传播方式应既符合现代受众的需求，又能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以此确保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实现广度与深度的统一。

（二）科学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首先，对当前国家安全形势进行深度研判，全面了解我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是制定有效国家安全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通过全面、深入且准确的分析，才能精准识别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短板和不足，明确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领域。这样的认知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优势，还能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补充和支持。

其次，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过程中，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智慧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和哲学理念，这些思

想不仅能为我们认知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环境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够帮助构建更加全面精准的思维框架，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安全风险。例如，传统战略文化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和灵活应变策略，为今天应对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了思维方式指导。面对安全挑战时，固守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容易陷入困境，只有不断调整思路、灵活应对，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安全环境，这种应变能力的培养显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学习与吸收。

再次，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要牢牢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4]，并始终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关联性特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独特的国家安全文化，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支持；同时，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还有助于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这是我们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最大底气和保障。

最后，运用多元跨领域视角是全面系统应对复杂安全形势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跨部门协作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具有明显的军事和政治导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逐渐拓展到文化、科技、生态等多个领域。在此背景下，各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不仅是资源整合之需，更是构建全方位国家安全防护网络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跨学科合作是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途径。国家安全研究必须跳出单一学科的局限，吸纳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形成多元视角的综合分析。这不仅有助于对当前安全挑战作出更全面的研判，也能够提高国家安全体系在应对复杂局势中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只有通过这种多元跨领域视角，才能构建起覆盖全领域的认知框架和分析工具，实现对不同安全领域复杂情况的深入洞察和准确把握，确保国家安全工作

精准实施,保障国家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 更好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

规律是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两创”过程中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不相契合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应用限制。因此,只有把握国家安全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解决好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度问题,进而增强传统战略文化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积淀与实践检验形成的智慧结晶,具有穿越时空的真理力量。这些战略文化资源对于把握国家安全基本规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民本思想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5]的当代理念、“未雨绸缪”的智慧与“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16]的实践要求等,这些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精髓,与当前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具体举措,在精神内核和实践逻辑上是一脉相通的。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显著优势在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分析,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在未来再次发生。历史的周期性和相似性决定了我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经历类似的安全威胁和战略挑战,这使得我们可以借鉴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更加准确地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然而,历史经验的借鉴并非简单地复制,每一时期的战略环境均具有自身独特性。因此,在参考历史时,必须结合当下的具体现实条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机械化套用。应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适应现代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出契合当下的战略方案。

(四) 逐步形成国家安全研究范式

国家安全研究范式是指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时采用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总体模式。面对丰富广泛的研究对象、复杂多变的安全

问题,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加快构建国家安全基础理论体系,形成国家安全研究范式。

一方面,要形成“以史为鉴”的思考模式。无论是国家安全内容的理论化阐释,还是具体安全领域问题的解决措施,都应自觉从历史角度进行分析研判。这种长远眼光、全局观念的思维模式对于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发展不仅涉及内部安全环境,还需考虑未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只有具备长远的战略目光,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意味着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要从整体出发,统筹兼顾各个领域的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将这些领域视为一个整体,确保各个维度的安全互相支持。因此,在现代国家安全和战略制定中,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出“第二个结合”的优势。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思想根基既源自多维度的理论创新,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智慧积淀。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现代安全需求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新时代国家安全观相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得以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适应性的完整框架,从而更深刻、更系统地回应当今世界的安全风险挑战,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 人民日报, 2024-10-29(1).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4: 39-40.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22: 221.
- [4][1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7、20.
- [5] 王泽应.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综论[J]. 中原文化研究, 2023(3): 6.
- [6] 杨海.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12): 54.
- [7]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38.
- [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2: 4.
- [9] 何哲. 如何理解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N]. 学习时报, 2023-08-14(4).
- [10]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 2022(14): 4.
- [12]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9.
- [13] 尹朝晖.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借鉴价值[J]. 理论探索, 2013(5): 64.
- [1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23.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
- [16]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19-12-01(1).

责任编辑: 殷一榕

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嬗变探析

刘招成 张泽宣

摘要: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引导私营工商业者,使其经历了从疑虑抵触到理解支持,再到积极参与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思想嬗变过程。党在思想改造工作方面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问题:一是改造工作推进急于求成;二是侧重对企业的改造,而相对轻视了对人的思想改造,使得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难以适应新角色,产生心理落差与隐性抵触。这些经验教训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社会变革愈复杂,思想观念愈多元,愈须尊重思想转化的渐进性与人性化,防止急于求成,确保政策可持续、社会稳预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嬗变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上海这座工商业城市率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经济复苏让工商界振奋不已。1953年更被上海乃至全国工商界视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1]。然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使工商界流传出“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2]的喟叹,这既表现出他们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留恋与不舍,又透露出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忧虑与彷徨。若是将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嬗变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动员背景下,其本质是“改造主体与改造客体”之间的现实博弈,是党通过主动的意识形态教育,依托统一战线,借助系统化的政策宣传机制与多层次的教育平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

文基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致力于突破传统“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着重揭示意识形态统合、制度变革与个体选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理解党与私营工商业者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见解。

一、政策演进与工商界的初期反应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经过三年多国民经济恢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1952年6月,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各阶级结构时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这表明毛泽东已将对资

收稿日期:2025-04-11

作者简介:刘招成,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泽宣,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提上日程。同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在国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肃清,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4]。同年 9 月至 10 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认为需要 3 个 5 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 10 年或者以后更长时间才开始过渡。但具体如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党中央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解决方案。

1953 年春,李维汉率队赴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开展深度调查,随后向中央递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审阅后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在 6 月 15 日的首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随后决定对私营商业亦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这一重大决策引发工商界普遍不安。荣毅仁对此曾坦言道:“在灵魂深处,对放弃剥削,背叛原来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毕竟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存在不少糊涂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私营企业主关心的首要问题。”^[6]盛丕华也表示:“一接触到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我们往往会彷徨、动摇、顾虑、犹豫。”^[7]

为化解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和不安,1953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他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同时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8]。次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 49 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指出:

“一九四九年公私的比重,公四私六,到去年底公六私四;绝对数字公私都增加,国营增加的多,

这个趋势就说明是在过渡,我们不要隐讳这个趋势。”^[9]9 月 15 日晚,毛泽东与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郭棣活、包达三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并共进晚餐,他谈道:“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即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实上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10]至此,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针在党内基本形成共识,中央高层也确信,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11]。

1953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这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加强工商界统战工作的重要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向大会作了有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等问题的报告^[12]。

经过这次大会,许多工商业代表以本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后的显著成效,证明国家资本主义优于私人资本主义,认清了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前途和努力方向。以上海私营纺织业 38 家工厂的盈亏情形为例,私营工业代表郭棣活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刘鸿生、周叔韬、童少生、荣毅仁、刘靖基等也结合亲身体会,说明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经理李国伟感慨:“我办了几十年工厂,过去常受军阀、国民党匪帮、地痞、流氓的气,办吧,工厂朝夕不保,不办,有点舍不得,像孤儿一样。解放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企业发展了,我自己的经历教训我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他又说:“我的厂,过去不仅剥削过工人,也剥削过农民,如用大秤称农民的棉花等,我今后,一定要好好经营,为国家为人民多服务,一定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那时,到达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消灭了,个人是愉快的。”^[13]

总路线公布初期,上海作为全国工商业中心,私营工商业者对总路线的态度显著分化。一些大厂的私营工商业者多表示“大势所趋,不得不走”,但对如何走法仍存有顾虑。某染织厂业主担心“合营初期政府可能会给予照顾,但过段时间进行评级评薪时,没有特长的就要量才录用降级降薪了”。这种顾虑在民华电线厂的案例中表现得更为具体,该厂业主向工会主席直言:“我们厂什么时候合营?怎么合营?最好快一点合营。”工会主席反问他合营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将来工资怎么办?”中小型厂的私营工商业者态度更为复杂,他们说:“做老板迟早死路一条,必走‘联合国’的道路——先联营,后合营,最后国营。”也有人自嘲:“做老板总是‘日光灯’——日蚀(蚀本)、吃光、等改造。”

然而,另一部分小型企业主对改造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我们小型机器厂的老板亲自动手生产,和工人没啥两样,也吃得来苦,希望早点合营变国营,人可以归队,更好在技术上发挥作用。”从经营角色和技术背景来看,具备专业技术且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的私营工商业者,其积极性明显高于缺乏技术且不参与经营管理的同行。胜德化工厂资方坦言:“有技术的人没有问题,我没有技术怎么办?我也准备好了,即便不能继续担任厂长,做个文书工作也可以接受。”作为经营代理人的私营工商业者相较于直接经营者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其中具有专业技术的代理人又比无技术背景的代理人更积极。美光纺织厂4位代理人就主动提出改进经营管理制度,认为“实行合营未尝不是好事,可以分享红利”。缺乏技术的代理人则忧心忡忡,永新厂代理人便是典型,“工会开会我不是会员无法参加,工商联开会我又不符合私营工商业者身份也不能参与,这次总路线报告更是两头不沾边,恐怕合营后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了”^[14]。

根据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宣传总路线尤为必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闭幕

后,即要求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必须在当地中国共产党党委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总路线的传达教育,布置学习,集中力量来完成这一工作,并应该以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15]。以上海为例,1953年10月至1954年5月间,市工商联共举办90场传达报告会,覆盖全市50%的工商业户,参与人数达87400余人^[16]。

尽管宣传教育系统推进了私营工商业者对总路线的认知,但部分群体的理解仍存在明显局限,尤其在涉及前途问题时,大家观点不一。机器工业从业者李泰云表示:“旧社会中曾觉前途迷茫,学总路线后,既明了国家发展方向,也清楚个人所处地位与工作方向。”而环球货品业的郭琳爽则认为:“虽在理论上认同社会主义前途光明,但尚未看到实际变化。”在当前利益问题的认知上亦是如此。文教用品业的潘蒂兰坦言:“过去对公私合营存在嫉妒心理,提到国营厂的产品总说是好的,便宜的,难道私营都不行吗?通过学习,认识到过渡时期,只有国有经济不断发展,私营相对弱小,才能早日完成工商界改造,妒忌与顾虑是非常狭隘的思想,值得批判。”毛纺业的刘念智则表示:“总路线为何不早提出,也好使我们少犯些五毒,更能服从国营领导。改造总是要痛的,思想改造也是如此,而且一定要痛,不痛改造不彻底,不过不是割头那样痛。”^[17]

总体而言,宣传教育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使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对总路线有了初步了解,但尚未促使其形成深层次的思想认同,亦无法改变其唯利是图的本质。于是,部分私营工商业者便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社会主义改造。

二、基于政治环境下的现实博弈

1953年12月,上海市报请中央批准17家工厂实行公私合营,经中央研究,最终确定14家作为试点。这一举措不仅树立了行业标杆,也为上海全面推进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私合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复杂多变。起初,他们持乐

观态度，将合营比喻为“出嫁姑娘找到对象了”；随着谈判深入，他们开始担忧职权和资产如何折算，担心“大权旁落”或“一贫如洗”；待职位与资产折算明朗后，看到政府在处理资产时的公平合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又会得寸进尺，提出许多自私自利、过高甚至不合理的要求^[18]。这 14 家工厂的私营工商业者尚有这样的思想状况，那么上海其他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究竟怎样呢？

1954 年，上海市劳动局为深入了解私营工商业者对公私合营的态度，分别在东、西、南、北 4 个区召开劳动科联席会议。这 4 个区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集中反映了当时上海工商界的整体思想动态。在会议上，工业资方大部分满意改造、明确前途，部分企业积极酝酿合并扩大以争取公私合营。但部分劳资关系紧张或情况困难的企业存在“丢包袱”思想，年长且无技术的资本家顾虑多，中小型企业则有急于联营的盲动情绪。商业资方表面拥护改造，实则大多数思想混乱，存在消极悲观、牢骚满腹、顾虑重重等情况。美优药厂唐雄彪提出，“愿意先走一步”，并要求国营制药公司准许其从目前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收购形式，提高为包销的中级形式。虹口区中国自动电讯器材行鲍熙年反映，“公私合营后外债要个人负责，对旧设备折扣率又很大，再则自己今后的地位又不知如何”。中兴铁工厂资方（杨浦区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五反”后意志消沉，无信心扩大生产，不肯多接加工任务。杨浦区劳动科了解到，该厂 1954 年第一季度，按生产设备可出 4 部车床，但仅出了 3 部。北站区锦昌机器厂陈沧海则关注职工福利保障，指出：“公私合营后，职工福利金仅占 10% 左右，比起现在工人所拿的福利来，不是降低了吗？难道这样不会影响积极性吗？”他又说：“总路线来了，小企业都有消极悲观之情绪，真所谓请大户班头车，中户二头车，我们小户是脱班车。”家庭工业社厂蔡培璣及中国飞轮制线厂都认为：“公私合营，钱拿的少了，

家里开支怎么办呢？同时预料到公私合营后对他们的要求，一定是高的，自己工作经验又如此地差，不知今后是否有工作可做，或者是即使有工作能否做得下去。”^[19]

这些复杂的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使得公私合营的推进面临阻力和不确定性，在生产经营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了改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现实博弈。有些私营工商业者用抽逃资金、滥分盈余、转移物资、虚报成本、偷工减料，甚至安插亲信、挑拨工人与政府关系等手段抵制改造。例如，好来药物厂的私营工商业者不仅购买了 2 幢洋房（其中 1 幢赠予代理人）和 2 部钢丝录音机，还私自盖章提取了 1951 年的利润，并抽资 30 亿用于分红。中国轧钢厂的私营工商业者在要求公私合营的同时，将 200 多吨的原材料隐藏起来，影响了生产。安达纱厂的刘靖基通过向私商赊账购买 6000 纱锭设备，增加固定资产，意图在合营后通过企业盈余偿还欠款，以此增加私股比重。申新系统则在总路线公布前将总经理的亲信安排到各厂担任厂长或副厂长，并进行人事调动，以确保对企业实权的掌控。玩来机器厂在总路线公布后，计划将会计科长提升为新增设的总务处处长。顺昌机器厂的 68 名职工在接受国营订货时，资方虚报了 1958 万元的成本，占合法利润的 40%，资方将 1268 万元用于职工福利，试图掩盖其不法行为并挑拨工人与政府和工会的关系。勤民机器厂的私营工商业者通过其儿子在国营工厂工作的便利，窃取了光学仪器的全部设计图样，并挖走了该厂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导致国家任务无法完成^[20]。

此外，少数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仇恨工人监督，侮辱国家税收干部与职工，甚至行凶杀人。据上海市人民法院统计，1954 年 1 月至 7 月共发生 34 起案件^[21]。实际上，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是当时中国具体历史环境的无奈选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认知失调后在心理调适作用下的一种妥协，是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生存需

求而作出的被动回应”^[22]。

针对上海工商业者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行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综合整治措施来保证改造的顺利进行。除继续开展总路线宣传教育外，上海市人民政府还积极发动职工群众揭露私营工商业者的破坏、抗拒及腐蚀行为。1953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精神，按四方面分配原则，制订了《关于私营企业盈余分配的七项规定》^[23]。该规定对盈余分配条件、行业协商机制、企业分配流程、违规处理以及审核机制等方面均作出了详细且明确的规范。在处理股东垫款问题上，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外松内紧、垫松抽紧、分别对待”^①的方针，有效遏制了不良现象。对情节严重的不法行为，政府依法严惩。1954年12月，市法院对24起案件进行了判决，召开了区宣判大会，起到了震慑作用^[24]。

在公私合营阶段，公私合营企业在性质地位、股权清理、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以及政府领导管理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2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依据1954年9月2日政务院发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在当年11月组织开展为期21天的学习活动。通过组织学习、讨论和经验交流等方式，逐步引导私营工商业者正确认识公私合营的意义和政策精神^[26]。这次学习为上海市即将到来的公私合营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1955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对一些保守思想的批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快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下的思想转变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得以顺利推进，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统

战工作以及上海市党政部门的宣传教育。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分别在颐年堂和怀仁堂约见工商界知名人士，进行深入交谈。毛泽东让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27]。他指出，“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28]。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上海工商界代表热烈讨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真是“一语道破，指点出来”^[29]。1955年11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邀请全体委员举行座谈会，由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定息、经济改组和全面规划进行详细的说明^[30]。1955年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爱国工商界应该积极努力，把先进分子和骨干分子的队伍壮大起来，大家一起来担当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服从工人阶级领导，认清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1]。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代表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定“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32]。

毛泽东的指示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在上海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多数工商业者深受鼓舞，认为改造方向明确，信心倍增。光新印染厂业主以“长辈关怀晚辈”为喻，称“政府首长亲晤工商界代表，使我们深感温暖”；也

注①：所谓“外松内紧”是，对外称管理办法仍旧暂不修改，对内则结合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对抽逃垫款加强掌握。“垫松抽紧”是，垫入款从松，抽出垫款从紧。“分别对待”是，有正当理由并无害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允许抽取，否则从强调生产经营出发，加以限制。

有资方将改造比作“道路门牌清晰可辨，绝不致迷失方向”。纺织工业有个区副主任说：“现在看到棉布业中的夫妻店都可以公私合营，哪像我这个小厂，今后也可以上高级形式了，增加了我的信心。”然而，部分私营工商业者仍持观望或疑虑态度，尤以资金薄弱或业务特殊的行业为甚。整染漂浆业新城染坊资方表示：“社会主义改造你们先跑好了，我慢一些跑。”信大糖坊翟全昌则担忧：“可能会出台更严格措施；工商联执监委的动员或预示未来挑战。我顾虑难以适应劳动安排，又怕小业主与骨干待遇不同，未必能得到管理岗位。”^[33]此外，少数私营工商业者动机不纯，甚至抽逃资金、转移财产。大千燃料厂私营工商业者企图抽逃 1 万元工缴款项；静安区的信爱药房资方钱荣，在政府批准新药商业全业合营申请前夕，将店中名贵的药品偷偷摸摸地东藏西匿，最后被揭发^[34]。

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相比，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为明显减少。私营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出的两面性，表明和平改造中也是有阶级斗争存在的^[35]。正如陈毅所说：“上海抗拒社会主义的人少了，我就感到惬意了。另外极少数要抗拒到底的，这是极少数，几万人中有一两个。”^[36]

为进一步推动改造工作，1955 年 11 月 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宣传教育的通知》，要求“在最近期间，大张旗鼓地在本市 20 万左右的私营工商业者中，认真传达与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的精神”^[37]。为此，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工商界学习委员会在上海市工商联大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的学习委员会委员、顾问、学习小组和各区讲解员等 1000 多人。委员会分别于 195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下午和晚上，组织全市 21 个市区工商界行业区主任、小组长，举行了 15 场传达大会，市区 17630 位工商界基层骨干参加^[38]。学习后，工商界对社会主义发展

规律的认识得以深化，对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关联性得到明确，人心渐趋安定，骨干分子的积极性显著提高^[39]。据统计，“自 1955 年 12 月 12 日至 1956 年 1 月 6 日，听过传达的工商业者达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人（其中包括工商业者的眷属八万四千人）”^[40]。

1955 年 12 月 17 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陈毅在报告中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进入新阶段，大会通过了《关于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号召“工商业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真诚地、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国人民一道，走大家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41]。此次报告使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前途教育。酒菜业资方周心根说：“过去认为辛苦了三年好不容易弄的钱财，一下子没有了，觉得很可惜。听了陈市长报告中谈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远景，又看到子女都有工作，因此要求及早合营。”照相材料业副主委王湘永在听了报告后主动到业内传达，并向同业检讨说：“陈市长说我们工商界有小手小脚行业，我们业内自提出公私合营后，过去每月进货 15 万元，本月只有 3 万余元，自己过去每月进货七八千元，本月只进了 400 元，我向大家承认错误，回去就把银行里的钱取出运用。”^[42]料瓶业蔡竞能说：“我以往误解了共产党那个的政策是常常在变的，对资产阶级采取骗的政策，从这次陈市长的报告中，我认识了党不是在骗我们，而是要我一起过幸福的生活。”裘商业刘光楣说：“听了陈市长的报告后，我有这样的体会，对劳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以我企业的劳资关系看，形式上看是团结的，但实际是存在问题，劳方和我很少谈企业问题。过去我亦有这样错误的想法，认为我们资产阶级是鸡蛋，职工是石头，无法相撞，抱着息事宁人态度。现在体会这样做是不对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肯定有损失，表示以后应该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

坚持立场，解决问题。”裘商业石培均说：“过去对自己前途感到相当迷茫，曾有人比喻资产阶级为私生子，而被各方面所歧视，当时我亦有同感。现在明确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家庭成员之一，我们是有广阔前途的。”

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化，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意愿逐渐强烈，条件日趋成熟，纷纷提出合营申请。截至1955年12月底，私营工业中，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有55个，占行业总数的58.5%，连同个别企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共有17073家，占总户数的66.0%。私营商业（含饮食业、服务业）中，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有71个，占行业总数的73.9%，连同个别企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共有29142家，占总户数的49.4%^[43]。

1956年1月，北京率先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至上海，工商界情绪高涨，改造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以石油电机配件业为例，该行业过去以加工产品要求高为由不愿承接任务，而全行业有193户申请合营。已申请还未获批准的已买好鞭炮和备好“喜”字，他们说，“万事俱备，只缺一批”。经叔平、史慕康都提出：“应充分尊重工商界的改造热情，避免因‘分期分批’原则压制积极性。”^[44]

面对工商界的主动诉求，上海市人民政府迅速响应。1956年1月14日，上海市工商界300余位代表应市委邀请，学习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推行公私合营的成功做法，并就如何加快本市改造进程深入研讨。会上，30多位工商界代表发言，一致拥护采取北京的办法，在最短期间完成公私合营工作。他们说：“加快改造的速度正是上海市工商界的迫切要求。”^[45]次日，上海市工商联召开上海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荣毅仁提议在6天内完成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工作。他说：“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听了毛主席的话，紧紧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向全市工商界联合起来一次申请，并要求政府一次批准，来个满堂红。”^[46]盛丕华建议到会代表举手表决，

最终一致作出决定，1956年1月20日前的6天内做好准备，一次申请公私合营。

在此期间，上海私营工商业者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造，主动将黄金、美钞、银元及房产等资产投入企业增资。内衣织造工业百达内衣厂季慕卿召开家庭会议后，将兄弟7人私人所有黄金420两全部投入企业；大纶绒线张子甫将私人100多栋房产全部投入企业作为增资；国际贸易业马仲文、洪祖尧将1952年分得的盈余7万多元全部投入企业；国际贸易业永叶行康文听了报告后，向工会表示要写信去香港将9000元调回来作为投资^[47]。据统计，约113个行业、2533户、2674人投入企业现金38.8万余元、黄金1359.08两、银元15376元以及美钞等^[48]。

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洪流中，私营工商业者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可避免地顺应了中国共产党加速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进程，这也反映出私营工商业者在时代变革大势下所做出的现实抉择。

1956年1月20日，上海工商界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大会宣布，上海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203个行业、88093家企业获得全行业公私合营批准。具体包括：94个工业行业25853家（含7647家随同合营的个体手工业户），96个商业（含饮食、服务业）行业58978家，以及运输、建筑等13个行业3262家，一次全部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49]。《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上海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的上海，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50]

四、结语

通过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嬗变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功实践。党的和平改造政策通过主动的意识形态教育，依托统一战线，借助系统化的政策宣传机制与多层次的教育平台，成功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者思想改造，使其从最

初的疑虑抵触逐步转向理解支持,最终积极参与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党在政策执行中的灵活性与策略性,也体现了私营工商业者在时代变革中的被动适应与主动选择。

然而,实践表明,党在思想改造工作中也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难以适应新的社会角色,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出现抵触情绪。例如,一些企业一搞公私合营,马上搞一长制,把私方搁在一边^[51]。曾任上海华丰钢铁厂总工程师严开镐回忆:“1954年,华丰厂实行一长制和总工程师负责制,领导上把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共产党员)提拔为总工程师,安排我做技术课内的马铁专业工程师。我觉得党的政策变了,像我们工商业者弃如敝屣了,认为自己前途黯淡无望了。”^[52]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思想改造不仅仅是所有权的转移,更涉及深层次的思想转变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刘少奇强调:“使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情,是要准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来最后完成的。”^[53]这表明,思想改造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私营工商业者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试图融入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仍留恋旧有经济体制。这种矛盾心理是上海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例如,刘鸿生在被问及公私合营后是否感到惋惜时坦言:“作为一个资本家,我有点舍不得。但是,话得说回来,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我又舍得。”^[54]这表明,尽管他们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反复与挣扎。

从历史经验看,党的思想改造工作在短期内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当前,面对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多元化的思想动态,党须更加注重教育引导的渐进性和人性化,避免急于求成,确保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性。未来,如何平衡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教育引导

的深度,如何在变革中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心理需求,仍是党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69.
-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98、146.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76.
- [4]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3.
-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75.
- [6] 缅怀毛泽东(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0.
- [7] 工商界要认清前途接受社会主义改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8.
- [8][11][27][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1、285、495、497.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5.
- [12] 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李维汉报告国家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N].人民日报,1953-10-28(1).
- [13]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许多私营工商业者认清了今后的努力方向[N].人民日报,1953-11-10(1).
- [14][20][24] 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劳动局关于总路线公布以来上海资产阶级阶段和我们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B128-2-1236-1[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15]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认真做好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传达及学习的指示:C48-2-712-26[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16] 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市工商联会关于上海市工商界接受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

- 和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精神传达的综合情况：C48-2-706-123[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17] 上海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上海市工商界学习总路线总任务的思想情况报告：C48-2-707[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3.
- [18][23][36][37][41]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301-302、248-249、516、503、557.
- [19] 上海市劳动局.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当前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宣传贯彻中一些劳资双方的思想情况与动态的综合报告：B128-2-1236-23[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21] 李广仁. 李广仁对资本主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A76-2-128-40[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22] 董宝训. 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J]. 文史哲，2004(2)：66.
- [25] 李维汉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1.
- [26] 上海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工商界学习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计划报告及总结：C48-2-898[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
- [29]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二辑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60.
- [30] 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陈云副总理在 1955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A33-2-541-23[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5.
- [31] 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 [N]. 解放日报，1955-11-22(1).
- [32] 新华月报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1.
- [33]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上海市资本家和小业主对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二次执委会及上海市最近的改造形势的一些思想动态的初步反映：C48-2-1009-1[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5.
- [34] 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形势中 工商界许多人士积极要求进步 但还有一些人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等不良行为 [N]. 解放日报，1955-12-22(1).
- [35]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杨思区办事处.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杨思区办事处关于私营工厂职工对企业合营问题的反映和工商业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反映及讨论陈市长报告党的情况汇报：A71-2-1350-60[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5.
- [38] 听了毛主席的话 走社会主义的路 昨天工商界有一万七多人听了传达 [N]. 解放日报，1955-12-17(1).
- [39] 上海市工商界学习委员会. 上海市工商界学习委员会关于二十一个市区组织全联文件学习情况的反映报告：C48-21010-70[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5.
- [40][43][4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41、242、244.
- [42] 上海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工商界听了陈毅市长和陈丕显书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后的思想情况和各项具体表现的综合报告：C48-2-1150[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5.
- [44] 陈丕显，曹荻秋. 陈丕显、曹荻秋关于上海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在七天之内全部完成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做法的报告：A33-1-97-1[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6.
- [45] 上海市委邀请工商界代表座谈讨论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速度问题 [N]. 人民日报，1955-01-15(1).
- [46] 上海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全市私营工商业要在六天中一次申请合营 [N]. 解放日报，1956-01-16(1).
- [47] 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上海部分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增加投资情况的一些材料：A33-2-456-17[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6.
- [48] 上海工商社团志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32.

- [50] 上海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N]. 人民日报, 1956-01-22(1).
- [51]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 陈毅传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506.
- [52] 寿充一. 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原私营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纪实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146.
- [53] 刘少奇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82.
- [54] 刘念智. 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124.

责任编辑: 蒋建忠